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碩士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本)

象徵強國

微信公眾號文章的生產與交換

指導教授：馮建三博士

研究生：江平波 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縮寫表

縮寫	全稱
<i>MEGA</i> ² II-2: 1	<i>Marx-Engels-Gesamtausgabe</i> , Abteilung II, Band 2, Volume 2, S. 1
<i>MEW</i>	<i>Marx-Engels-Werke</i>
<i>MWG</i>	<i>Max-Weber-Gesamtausgabe</i>
馬恩文集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馬恩全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二版）

摘要

微信公眾號文章是一個重要但研究缺乏的領域。第一章檢視了既有研究的各種思路，尤其是審查和宣傳，強調了國家在其間的巨大影響，或將之簡單歸於意識型態，但我不認為這是主要方面。我提出的思路是關注文本承載的知識和思潮，如何挑戰了舊有劃定的分野和敘事，又同時鞏固了基礎，這些都與文章間傳遞的讀者／作者間的關係息息相關，不僅是閱讀關係，也有金錢來往。第二章我探討了「意識型態」概念的起源與爭鳴，尤其是馬克思的相關論述，以及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問題，並以馬克思自己的論述出發，提出一種地質學或地層學的基礎／上層建築觀念，這些論述與理論的討論也將服務於後續章節。同時，嘗試用布赫迪厄的象徵財貨經濟的唯物論來拓寬古典理論的範圍，並試圖以霍耐特和洪席耶的理論批判完善，一是以承認來說明象徵資本，二是肯定智力、審美上的平等，布赫迪厄的理論因此可以運用於無支配的未來。最後，探討作為文化產品的複製、商品化和群眾創造的時代問題，從微信公眾號文章和打賞出發，可以提供一種怎樣的超越模式。我發現，要改變對藝術的看待方式，將之視為打破可感的分配，從而我們可以捐獻作為一種饋贈，為社會的無分者提供有條件的基本收入，也就提供創作的閒暇時間，從而建立起共有的空間，對抗資本主義。

目錄

目錄.....	1
第壹章 問題意識.....	3
第一節 如何研究中國社交媒體？.....	3
一、國家控制信息.....	5
二、國家以外，是社會嗎？.....	9
第二節 微信中的中國社會思潮.....	11
一、誰是知識份子.....	11
二、新出版與新讀者.....	14
三、這是民族主義還是其他？.....	15
第三節 餘皆金錢.....	18
第貳章 理論.....	24
第一節 什麼是意識型態.....	24
一、意識型態是如何成為馬克思式的.....	24
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	28
第二節 象徵暴力.....	32
一、意識型態及其批判.....	32
二、人，象徵動物.....	36
三、承認.....	39
第三節 回啟經濟學.....	43
一、馬克思及其後.....	43
二、藝文世界.....	47
三、重思上層建築.....	51

參考文獻.....	54
索引.....	76

第壹章 問題意識

第一節 如何研究中國社交媒體？

研究中國互聯網與社交媒體，國家與社會是最主要的視角，國家之強已是共識，不過國家之外的其他行動者有多強呢？甚或，國家這麼強，其他組織和個人有沒有解放的可能呢？

本文中，我將主要關注微信公眾號文章，這些日常性的文本充滿了中國特色，而既有研究的關注與其重要性並不相稱。據微信掌門人張小龍自己在 2021 年初的演講中說，「每天有 10.9 億用戶打開微信……有 3.6 億用戶讀公眾號文章」，第三方機構「新榜」日常監測的逾百萬公眾號一年共發文 3.87 億¹。公眾號包括訂閱號與服務號，這裡僅分析訂閱號，現時一般用戶註冊後可每天推送一次，而媒體號等則可一天多次，推送內容包括圖文、文字、視頻、音頻、圖片消息，也可轉載，因主流的推送內容是圖文消息，故本文僅分析此種類型。每篇文章發佈後，就可以在微信平台內傳播，其他微信用戶瀏覽後可評論（這個問題較複雜，暫且按下不表）、打賞、收藏、分享文章，還可選擇訂閱該公眾號，持續接收該訂閱號的信息。這些文章在微信應用中流通，所以會經常出現在人與人的日常聊天中，太過平常，就不一定有所意識。而且，這些文章會在對話中以卡片的形式出現（在最近一年，這個卡片的形式稍有變動，除了原有的文章標題外，也會在卡片下方註明微信公眾號的名稱和頭像），而其他互聯網上的內容，則必須先在微信內置瀏覽器中打開，以「傳送給朋友」再轉發進入對話，才会有卡片形式。這些文章得到的關注遠遠不及它們的閱讀量和影響力，也許是因為這所有過程都發生在軟體內部（研究者難以引用），其實，這些文章在發佈時都會生成對應的網址（其實是相同效果的兩個網址，具體參見參考文獻中所引公眾號文章），只是需要再點擊「在瀏覽器中開放」把它

¹ 張小龍的「微信公開課」：<https://mp.weixin.qq.com/s/LwkXAhTHx3fkToQMsy5lDg>；「新榜」的報告：<https://mp.weixin.qq.com/s/1djzYH1Qqe5iGA83Cfzvvg>

們提取出來。它們的閱讀量只計算微信應用內部的，不計算使用網址打開的，且最高只計到十萬，故比真實值要低。以巨量微信用戶為基礎，公眾號的揭幕就等於打開了一種內容產業，它漸漸吸收了絕大多數的寫字人，吸收了整個既有的媒體產業，進而，這個公眾號的宇宙就成為了整個中國思想的儲備庫，它就不只有金錢的經濟學，還有人與人之間的思想碰撞與聯繫。所以，不能錯過這個問題。

Lu & Pan (2021) 以內容分析的方法發現大量政府公眾號的標題存在點擊引誘。Chen, Mao, & Qiu (2018, §4.5) 在討論微信這款超黏應用時，簡要地提及了一個事件，「范雨素現象」，一位普通的家政勞動者以一篇自我書寫引來關注和討論，卻止於微信的自我審查¹，可惜沒有深入研究，因為公眾號文章也是它超黏、佔用時間的原因。Guo (2020, chap. 8) 的研究關注了公眾號「咪蒙」。這位前《南方都市報》編輯之前擁有一個逾千萬粉絲的號，一篇文章作價數十萬人民幣（本文貨幣單位都是人民幣，後文不贅）。不過除了填補英文研究空白外，她更像是提出了問題，不僅在於如何理解文本群、讀者群，而且還要考慮如何蒐集文本，因為在書還沒出版之前，「咪蒙」已選擇註銷（先前因虛構文章引起巨大爭議，並被官媒批評），那麼研究者該如何證明這些內容存在呢？香港大學的傅景華團隊和之前追蹤存檔微博類似，也對微信公眾號文章做了類似項目 WeChatScope (Fu & Yun, 2018, July)，從一篇研究簡要中可知，2018 年該團隊跟蹤的四千餘個公眾號（總的活躍號約五十萬）中，大約有百分之十的文章（因不同原因）被移除 (Wechatscope, 2019, February 11)。於是，我們可以得知，絕大多數文章沒有被移除，不能因為審查的原因，就將討論偏向被刪除的文章，而審查是無法決定文章內容，以及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的。整體來說，以微信文章為主題的研究，量化計量比較多，就在於越是巨量的文本，下定決心選擇計算越是容易，而難以去理解。

除了把它們看作被審查的文本，除了把這些文章看作眼球經濟，看作商機，除了把帳號和文章看作政府的行政指標之外，我們還可以從中讀到什麼內容？從像范雨素，而不像咪蒙，從一個個本來沒沒無聞、沒有媒體資源的作者，以及從一個個

¹ 原發表於「正午故事」公眾號，騰訊網版本見 <https://news.qq.com/a/20170425/063100.htm>

無名無姓的讀者群體，我們可以如何觀察理解當代中國人的表達、思想、思潮，以及其展現出的象徵秩序和經濟學。這裡僅作一粗淺序幕，將這些文本放置在中國互聯網和中國信息秩序下的討論，將主要在第三章進行，因為我們需要先整理已有的思想資源。

一、國家控制信息

國家的力量體現在對信息傳播與管控的運作，這些方法精巧的效果研究，主要來自政治科學、經濟科學¹。

政治學者 Guriev & Treisman (2019, 2020) 提出一種「信息專政」²的理論，認為現在的專政減少了肉體消滅和監禁，更少提出官方意識型態，允許合法的反對黨和選舉，與過去堂而皇之的獨裁不同，代表是普亨、李光耀等人。兩位學者認為該制度的關鍵在於獨裁者的信息操縱，獨裁者運用宣傳、審查 (censorship)、收買、壓制的方式，讓公民相信自己能夠勝任，而能看穿的精英難以將訊息傳給公眾。類似的方程式模型還有 Shadmehr & Bernhardt (2011, 2015)，他們還使用了賽局理論中的囚徒困境來刻畫兩個公民個體是否選擇革命，甚至特別囊括了職業革命家這一種特殊的公民。雖然這些模型試圖囊括所有情形，給出統一模式，並在信號、行動等關鍵點都有足夠的解釋力，但各國具體情況遭到大大簡化，公眾／精英如此涇

¹ 這個詞仿照的是政治科學 (political science)，用以指代當下的主流經濟學。因為「economics」一字本就是 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71/1879, p. xiv／郭大力譯，1984，頁 6) 提出，用來代替「political economy」這個「麻煩的雙字詞組」。不過，我無意排斥高等數學的運用，因為科學研究絕不拒絕先進的方法。

² autocracy (專政) 源自古希臘文 αὐτοκρατία, αὐτός 意為「單」；dictatorship (獨裁) 源自拉丁文 dictātor，即羅馬共和國的獨裁官，舊音譯「狄克推多」後改從日譯 (本為中性詞，為 Carl Schmitt 所歸納的「委任獨裁」，kommissarische Diktatur，見楊尚儒，2012)，但以「無產階級專政」對譯「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就因政治原因出現「專政」的譯法 (楊尚儒認為此譯法源於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文章中，凡註明過的翻譯，後文引用時徑自改動，不再出注，引文時註明原文的表示引文有改動，也不出注，唯文獻名仍如舊，以方便查考。

渭分明，另外，僵硬單一地以「革命」為目的，以及簡單地衡量成本與收益，就無法深入發掘在某些給定條件下，行動者間的複雜關係與行動的多元模式。根本的問題在於，經濟學中的成本應是機會成本，即與最佳備選之差，所以，審查的成本不僅是審查人員、工具與技術的花費，還應該包括審查帶來的人或組織間的額外溝通花費，這種真實成本，即機會成本的測算，與國家產出與政府預算的測算，雖難以統一口徑，但絕不能直接相等處理。最後，研究者對民主制的刻畫過於簡略，民主制下的統治者也不一定是勝任的，甚至不一定具有正當性（legitimacy）¹，他們也絕非不需花錢操縱信息，審查和監控本就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同樣侵害隱私與阻礙集體行動（Doctorow, 2012.03.02; Stoycheff, Burgess, & Martucci, 2018），如美國政府以稜鏡計劃（PRISM）監控本國與全世界，耗費遠遠大於小國的宣傳和審查經費。

Margaret Earling Roberts（2014, chap. 2; 2018, chap. 2）則注意到威權（authoritarian）國家的信息管控其實不是那種絕對有效的方式，而是種「漏網審查」（porous censorship），她提出的審查理論是她博士論文中「信息管控」理論的深化。其理論基於 King, Pan, & Roberts（2013, 2014, 2017）對中國互聯網審查的實證研究。三人的第一項研究先使用開發的工具實時監控千餘個社交網站相關主題帖文刪除與否，發現審查重點不在批評政府，而著力於潛在地引發集體行動的信息；第二項研究在一百個社交網站上大量發佈帖文，配合自主創設中文論壇引入規定的審查技術，以參與式實驗方法，逆向推測審查機制，再次證實前文觀點，並介紹了審核與審查、封鎖之間的差距；第三項研究中憑藉江西贛州章貢區網宣辦的2341封內部郵件中識別出43757條由所謂的「五毛黨」（或「網絡評論員」）在2013和2014兩年間發表的帖文評論，他們指出，主要的內容是宣傳口號，並據此

¹ legitimacy/legality（Legitimität/Legalität）這一組概念，本文分別譯為正當性／合法性。這組詞譯名眾多易混淆，如香港分別譯為認受性／合法性，中國有的譯為合法性／合法律性，有的反譯為合法性／正當性（劉毅，2007）。

估計這種評論每年在中國互聯網上會出現 4.48 億條，在商業網站中的評論大約每一百七十八條中就會出現一次。

Roberts (2018) 總結，基於恐懼 (fear) 的審查方式出現更少了，卡頓 (friction) 和灌水 (flooding) 的方式更多了，她特別指出，後兩者方式更加隱蔽，同樣可能出現在民主制國家中。

恐懼**威懾** (detering) 媒體或諸個體不能分發、分析、蒐集、消費某類型的信息，以影響信息流動……卡頓以直接增加信息分發和訪問的成本，像對信息徵稅那樣運作，將媒體和眾個體從被審查的信息那**轉移** (diverting) 開……灌水極大地降低了某些信息的成本，進而增加了其競爭信息的相對成本……讓人心煩 (distractions)，要求眾個體花費更多精力從可得的信息中細細篩選。(pp. 42-43)

可將此理論歸納為下表：

表 1：M. E. Roberts 的審查模型

機制	恐懼效應	卡頓效應	灌水效應
訪問方便度 (Accessible)	-	難	易
信息彙整度 (Aggregated)	-	低	高
公民可感度 (Observable)	較高	較低	低
政府的成本 (Cost)	高	較低	低
反作用 (Backlash) 機率	較高	較低	低
可測量程度 (Measurable)	-	高	低

資料來源：筆者整合自 (Roberts, 2014, chap. 2; 2018, chap. 2)

她的審查理論使用了經濟學的隱喻來分析這三個理念型 (Idealtypus)，即政府控制獲取不同信息的成本來間接控制信息的獲取。Roberts (2018, p. 37) 將審查定義為「當局認為某信息能以公眾問責的方式削弱當局，當局就**限制**公眾表達或

訪問該信息」，這拓展了審查的定義，審查中的「灌水」一項就與傳統的宣傳出現了交集，而宣傳又是政治傳播研究長久以來的一大重點。在中文中，宣傳的灌輸論是一種比較常見的用法，¹而劉海龍（2020）認為，該話語現主要用於教育領域，隨宣傳之發展已不多見於宣傳話語中。

有一種較新的觀點是信號論，即認為這些宣傳不用作說服和灌輸，而是以政府的宣傳標示其維持社會管控和政治秩序的能力，公民接收的是該方面的訊息。黃海峰的研究選擇了中國某所大學大二的學生作為樣本，以問卷調查的方式，發現意識型態和政治教育方面答得準確與否與對中國、中央表現、地方表現、政府能力、政治體系的滿意度沒有顯著關係，卻更對政府在維持社會穩定上的能力評價越高，且更不願參加學運（Huang, 2015）。他還試圖區分「硬宣傳」及其反作用，在之後的研究中，他用一種心理學實驗的方法，從網上招募了 598 位被試，分組讓他們看不同宣傳材料，²與對照組對比，發現其中一組習近平巡視黨媒的材料會激起對政府的負面看法（Huang, 2018）。

最近的潮流將宣傳和大數據結合起來，提出了「計算式宣傳」的概念，其特色為「自動化、擴散能力（scalability）、匿名性」，都經過「計算式增強」

（Woolley & Howard, 2019, p. 5, 7）。這些研究是針對中國政府在境外的影響力的。牛津大學的研究關注推特的中文內容，發現流亡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人士大量在宣傳時使用機器帳號和算法（Bolsover, 2019），卻沒有充足的證據能證明中國政府

¹ 「灌輸」這個術語在中文中來自對列寧的小冊子《怎麼辦？》的翻譯，「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第二章第一節第二段首句）。但這只是譯文，原文「沒有一個對應的動詞『灌輸』，而是一個介詞詞組」（陳力丹、黃煜、廖雪婷，2019，頁 23），「被帶給」或「不會來到」，中文譯作「灌輸」尤為特殊。

² 這組材料他沒有給出來源，一則是以新華社的一首歌頌習近平的詩配以中國中央電視台「央視姓黨 絕對忠誠 請您檢閱」的圖片，詩可見 <https://www.lanjinger.com/news/detail?id=132>；另兩則分別是在〈中國青年網：應堅決把任志強清除出黨員隊伍〉，見 <https://news.sina.com.cn/c/nd/2016-02-25/doc-ixfpvysv4881349.shtml>，與〈央視：95%海外觀眾對央視春晚滿意〉，見 <https://news.sina.com.cn/c/nd/2016-02-08/doc-ixpfhzzq2641773.shtml>

有類似的行爲，對台灣的干預也是如此（Monaco, 2019, pp. 116-119）。這項牛津大學的研究缺乏在地視角，不熟悉中國官方宣傳話語，而且研究的時間段選擇也欠佳，竟然選擇在了農曆春節（Zhao & DeDeo, 2020, p. 2）。從這項整體、大範圍的研究中，不熟悉在地情況又想獲得整全統一理論的學者，又一次犯了想當然的錯誤，概念先於實踐而行。

自 2019 年中香港反修例運動開始，推特先後因香港、COVID-19 全球大流行停權了約三十五萬中國相關的帳號，並三次放出數據集以供研究¹。對這些數據集的研究發現這些帳號中，一部分確實使用中文的帳號，會有規律性地在工作日工作時間發言，並出現不同帳號發佈相同內容的情況（Uren, Thomas, & Wallis, 2019; Wallis et al., 2020; Wang, Lee, Wu, & Shen, 2020）；也有研究發現這些推特上的發言，主要針對的可能不像推特所言，而是像郭文貴這樣在中國不允許討論，但同時聲名在外、不得不與之爭辯的人士（Zhao & DeDeo, 2020, p. 16）。於此同時，中國政府試圖提高在推特等媒體上的影響力，也是事實，有公開過（後來撤下）的招標項目可佐證（中國政府採購網，2019 年 8 月 16 日）。有關臉書與推特新疆相關內容的研究報告也認為，其中不僅有官方媒體，還有中共支持者的發言，後者的觀點真的可以歸併入前者嗎，畢竟對中國人，甚至不少移民的中國人，這些社交媒體都不一定是主要使用的平台（Zhang, Wallis, & Meers, 2021）。

二、國家以外，是社會嗎？

除了從國家力量的角度切入，另一脈則帶著市民社會的眼光來觀察；前者一般來自政治與經濟科學研究者，而後者主要來自社會學者與傳播研究者。

¹ 推特透明度報告中列出了信息運作的部分，針對的是「試圖操縱推特的有國家支持的實體」，該公司還自豪地稱是「能以這種顆粒度和透明度提供【數據集】的唯一的公司」（見 <https://transparency.twitter.com/en/reports/information-operations.html>，可以在這個頁面找到推特公告的具體的鏈接，並可進一步獲取數據集）。

王瑾 (Wang J., 2019) 着力於中國非政府組織的非對抗性行動主義，這是一般英語學者沒能關注到的視角。比較尋常的做法是將中國互聯網的討論與審查聯繫起來。比如，認為微博代表了一個半結構化的公共領域，不過，論證卻只關注了大 V 等身份，而沒能就具體內容文本與微博討論的群體動力作出分析 (Wang Q., 2020)。韓榮斌 (Han, 2018) 以政治科學的視角，不只關注國家—社會關係，而轉向國家與個人之間的中介，重視這些人的影響力。同時，他也記錄下中國互聯網的一些關鍵名詞，如美分、帶路黨、五毛、自乾五 (自帶乾糧的五毛) 等等，並持平地描繪和評價了一些網路歷史事件。不過，他的材料太老，論壇時期的網路討論、上網人群與上網目的都有巨大改變。最重要的是，把支持政權方面的表達通通歸於「自乾五」，這樣的表述無助於理解，因為作者也知道這個標籤不過是用來與「自由派」作區隔的，並且這恰恰表現了所謂的「自乾五」並不以此為業。

2019 年 8 月，一篇《紐約客》的報導採訪了公眾號「北美留學生日報」，它已經發展成一個公司，在兩國都有工作人員，擁有一百六十萬的訂閱量，不過《紐約客》記者指出，內容有大量編造成分 (Zhang, 2019, August 19)。這篇文章被另一個公眾號翻譯發表 (見 <https://mp.weixin.qq.com/s/vNlohdEjBFijIFsiqfIv-A>)，如果點開這個頁面，會顯示「以下內容存在爭議」，下方並呈了兩方的後續爭論，提供了一個議題辯論的空間。

不過，我們仍然不能忘記，這些網路上的文本留存都經過了國家 (關鍵詞形式的) 事前審查和持續地可能地 (人工形式的) 事後審查，也即這些論述，只要你有影響力，大都落在國家允許的範圍之內。當然，國家很少直接親自動手審查，而是以林培瑞 (Eugene Perry Link, Jr., 2002, April 11) 所說的「吊燈裡的巨蟒」這一形式存在，讓出版業、網路內容服務提供者自行處理，因而結果常常是過度審查。研究者能夠蒐集到的文本不能直接與整個觀點光譜相重合，不過，這並不折損這些內容的價值，這些作者以知識人的形象出現，不論是所謂「自乾五」、「帶路黨」。

第二節 微信中的中國社會思潮

一、誰是知識份子

Drezner（2017／翁尚均譯，2020）發現了美國外交政策理念市場中公共知識份子的衰落和思想領袖的崛起，在他看來，原因是社會不平等和分歧加劇，舊權威不再奏效。鮑曼也提到這點，他還指出，知識份子「全都是自我定義」（Bauman, 1987, p. 8／王乾任譯，2002，頁2），以此劃清邊界。而如 Thomas Sowell（2009／柯宗佑譯，2014，頁15-16）所定義的，知識份子「『產出某種觀點，並且加以宣揚』，而不是去落實他們提出的觀點」，不過他同時認為這是一個「職業類別」，這是本文着力反對的。

齊慕實（Cheek, 1998／郭莉、黃新譯，2016，頁368）以鄧拓為例，展現了建國一代中國知識份子與政治的關係，

鄧拓的弱點是希臘神話英雄式的自命不凡，認為自己通過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意識型態和繪畫、書法及詩歌方面的美學訓練，可以決定中國大眾的最根本利益何在。這種自命不凡的心態在社會主義世界「被引導的文化」中是共通的。（頁357）

從他對知識份子的分析，可以管窺整個年代的權力關係，他指出，

毛澤東是鄧拓的終極庇護人，也就是鄧拓作為社會改造工程師的特權地位的保證人……毛就是鄧拓，就是成百上千的高幹知識份子（頁358）

中國知識精英所繼承並且激發了鄧拓投身職業生涯的——無論是參與公共生活的方法，還是神父式的服務公眾的身份預設——實際上都支持着中共當局賴以在困境中繼續掌權的各種權威模式。（頁368）

改革開放之後，知識份子的功能也漸趨分化，郝志東（2003/2020，附錄、第一章、頁340）把知識份子定義為，在批判的、文化的和社會的、教育的和職業的

這三種面向中，至少具備兩種。他以政治社會學的視角將中國知識份子劃為三個理念型：有機、批判性、無歸屬／專業型知識份子；以職業傾向區分為技術型（intelligentsia）與人文型。在他看來，批判知識份子遵循的是韋伯（Max Weber）意義上的心志倫理，有機知識份子遵循的是責任倫理（算是對韋伯的創造誤讀），是「某一階級的代言人而非是該階級的批評家，而不管其服務的對象是黨還是政府抑或其他階級」。這樣的分類問題不少，intelligentsia 其實來自俄國的批判知識份子傳統，更重要的是其道德和倫理的面向（張建華，2008，頁 20-30）。

劉曉波¹（1990，頁 4、6；1992/2017，頁 84）的批判有力地展現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性人格」，揭露了知識份子在八九民運中「對政府和對學生兩面討好，結果是兩面不得好」，這一角色「非常拙劣、非常尷尬」，故他提出要求知識份子以「爭取獨立的社會地位和發言權」為「核心使命」。在近幾年，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又因鍾情美國和一種所謂的「西方文明」而向川普靠攏（Lin, 2021）。²

同時，英文世界對中國思想界的關注和譯介增多了³，Reading the China Dream 網站就是其中的代表，三位學者還將譯文蒐集出版（這些問題的中文討論，可參陳宜中，2021），在導論中他們介紹了甘陽、許紀霖、蕭公秦、郭于華等觀點、經歷各異的知識份子，點明了中國的多元公共領域與目前面臨的危機。他們也指出，像錢理群這樣認同民間卻又身處精英之位的左翼知識份子，這其間的張力與挑戰十分重要（Cheek, Ownby, & Fogel, 2019）。魏簡（Sebastian Veg, 2019）的研究，正如其標題 *Minjian* 所示，討論的正是民間或草根知識份子，不過他的研究對象仍具有

¹ 劉曉波（1990，頁 155-160）雖然充滿了對馬克思的誤解，但他也被人誤解，他在 1989 年 3 月的後記中自陳他「立足於中國的民族主義，而決非……是『全盤西化』」，關注的是「全人類命運」和「個體生命的不完整」，他要做的是「1.以西方文化為參照來批判中國的文化和現實；2.以自我的、個體的創造性來批判西方文化」。

² 作者自己有個簡略的中文版，見 <https://matters.news/@linsantu/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bafyreiauru4fxptiyil5okvya5aeql77ty4nwzjyf37rfoltrewncpcph3a>

³ 得到譯介的包括朱蘇力、沈志華、汪暉、張一兵、陳平原、陳來、葛兆光、蔣慶、趙汀陽、閻學通、戴錦華等人。

一定社經地位，影響力較大，相較之下，陳宜中（2013，2016）編的知識份子訪談，部分人物更符合這個標準。與魏簡的工作類似，曾金燕（2016）早先提出的公民知識份子也關注獨立紀錄片導演，不過更重要的是她討論到的年輕女性主義者，她們不少還是大學在讀學生，就在該議題上發揮了知識表達的作用，有幾位也曾因此遭到逮捕（Fincher, 2018）。

知識份子自 12 世紀在西歐「隨著城市而誕生……作為一種專業人員」，源自城市的「勞動分工」（Le Goff, 1957, p. 9／張弘譯，1996，頁 4）。這種論述在過去近千年基本正確，但這種正確性還能繼續延續嗎？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獄中就提出所有人都是知識份子的觀點，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也在幾乎是同一時間提出，專業分工將使每個人成為自己細分領域專家，這些重要的論點卻遭到遺忘。我們知道，前述的這些內容，並不只有之前提及的這幾位知識份子在思考，提出觀點，其實更多人都在做這些事情，觀點思考都更為多元，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這才是本文的重點。

即使在學術領域，學者也不再能夠壟斷了，就算學術作品在參考引用時仍是首選，但隨著研究領域從經典文本、政治人物與事件向全領域的擴大，在一些領域中，非學術研究者的作品已然超越既有的學術研究。比如，魏簡（Veg, 2019）討論到的民間「文革」歷史研究，又如，研究網路文學的儲卉娟（2019，頁 106）承認，「即使具備研究者和愛好者雙重身份，我也絕不認為自己有資格和能力重新完成類似『通史』的蒐集和寫作」。前節中不能避談的翻牆問題，翻牆軟體的研究與迭代，及其歷史，這些都少見於學術作品，而是由活躍在技術社區中的一個個匿名人士完成，他們不僅記錄下歷史，也全球合作，互通有無，討論新的技術¹，再以通俗的語言和公眾分享²。學術、知識等領域的改變，離不開社會的結構性轉變。

¹ 這些行動主要在 github 上完成，歷史記錄見 <https://github.com/JadaGates/ShadowsocksBio>；討論版見 <https://github.com/net4people/bbs> 與 <https://github.com/ShadowsocksR-Live/shadowsocksr-native/wiki>

² <https://gfw.report/>

二、新出版與新讀者

研究中國新聞自由的學者孫旭培（2013，頁 46-48、87）指出，新聞自由是法內自由，他充分肯定了清末的出版自由，認為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民間辦報、批評政府一直是存在的」，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聞自由多有批評，認為「憲法墨跡未乾，言論、出版自由都被束之高閣」。在這幾十年中也有民間出版蓬勃之時，多是由於短暫的權力真空，如文革（許陳品，2014）、改革開放初（華達，1981；中共研究雜誌社，1980-1985）、八九民運（斯影，2019 年 5 月 21 日），抑或是文學刊物（貝嶺，1998 年 6 月 21 日）。但這些流星般的刊物其實也深受地域之限，多集中於北京這樣的文化中心，即使是全國範圍的文革，也是北京留下了更多的材料¹。

互聯網的興起部分改寫了這一歷史，1991 年開始就有中文電子期刊在海外出現了（儲卉娟，2019，頁 108-111），而我們知道，中國直到 1994 年 4 月 20 日才正式接入我們現在所稱的互聯網。所以，即使政府不歡迎，也出現了政治性質的民主運動刊物（溫雲超，2009）、歷史研究刊物（Veg, 2019, chap. 2）等等。而政府允許範圍之內，就更是迎來了井噴式地增長，每一個微信公眾號其實都是一份刊物，繼而需要相應的讀者，在塔爾德（Gabriel Tarde, 1901, pp. 11-17/1969, pp. 281-283）看來，刊物與讀者間「互相選擇，繼而互相適應」，他不同意勒龐²（Gustave Le Bon）的「群眾時代」論，認為十九世紀末是一個印刷、鐵路、電報技術帶來的「公眾時代」，而刊物創造的公眾，同質化程度更甚於群眾。他指出有的地區的人從沒見過猶太人，卻興盛反猶主義，正是因為閱讀反猶太主義的刊物，類似地，他

¹ 宋永毅編輯的《新編紅衛兵資料》中，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別是北京和其他地區的小報，而第三部分只比第二部分多了 12 卷。

² 他的《烏合之眾》（*Psychologie des foules*, 1895）一書，在最近二十年出版了至少三十個譯本，成爲一種現象，可參考駱思航的評論：<https://www.silentmarching.com/post/190826739404/乌合之众与中国的精英主义群体心理学>

也把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傳佈歸因於傑出的評論員：馬克思（Karl Marx）和克魯泡特金（Kropotkin）。

這樣的出版形式自然與傳統的書籍是不同的，夏蒂埃（Roger Chartier, 2004, p. 146）指出，同樣是刊物發表的文本，電子版相對於紙本，就等於從原有版面中抽離出來，過去的版面語言不再有效，讀者自己賦予文本脈絡性的理解，這會變得更為重要。這種作者和文本的脫鉤（他認為作者、文本、物質上的書本間的掛鉤是印刷術發明前書籍史中的一大革命），以及超鏈接式文本¹賦予了讀者更大的能動性（pp. 141-145），夏蒂埃的這些觀察卻與微信公眾號文章不盡相同。微信公眾號的推送更像一部連續出版而時效性強的紙質刊物，作者的標示不僅出現在文章的細節和特色中，也以公眾號的頭像、文章的版式設計和相對穩定的推文時間而加深作者和讀者間的聯繫，又因為微信平台禁止外鏈的封閉性而更似紙質刊物。

在完成公眾號的文章編輯後，運營者就需要點擊右下角的「保存並群發」，來安排發送事項，雖然這裡用的是「發」，但其實這是一個數位時代的出版行動。這樣由個人或群體生產、連續或斷續出版的文本（不過，本文主要研究個人或以個人形式運營的公眾號，也即在傳統刊物出版之外新開闢的領域），這種公眾號作者不自由的自由地出版，與網民讀者自由的不自由地閱讀，共同形成了我們看到的微信公眾號領域，一個龐大的、競逐的觀點市場。

三、這是民族主義還是其他？

在這個觀點市場中，最為學者注意的，最近是國族主義（nationalism）。研究傳播的學者就在「國族主義」前加上了「網路」二字，創造了一個新的概念「網路國族主義」，在這種類似的路徑下，以帝吧出征這樣的事件，《國際新聞界》組了一期專刊（王洪喆、李思閩、吳靖，2016；王喆，2016；周達、苗偉山，2016；郭小安、楊紹婷，2016；劉海龍，2017，2020；鮑羿岑，2018），以「共青團中央」

¹ http 就是超文本傳輸協定（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Sir Tim Bernes-Lee 的這個想法開啓了我們現在使用的 3W 網。

為代表的帳號為研究對象，也產出了大量的論文（連俊翔，2020；黃幀昕，2019；楊錄民，2019；羅廣彥，2019）。劉忠博、陳娟、邵成圓（2019）關注的是周小平，僅僅對內容做了數據分析，而缺乏進一步的理解，可以說是這類研究的代表。其他一些論文關注到了粉絲控評、表情包迷因等一些新現象，不過，我將這些論文發現的內容與二十餘年前相比基本無異（董立文，1997）。我們其實要探討的是如何看待國族主義。

錢理群（2017，頁 77）敏銳而明確地指出，

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是中國知識份子與中國共產黨關係的基石，既是出發點，也是歸宿，是一個起長期作用的支配性、決定性因素。而中國共產黨的歷屆領導人也都要自覺高舉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旗幟，以維護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錢理群的經歷和觀點能為我們提供幫助。他父親和一個哥哥去了台灣，其中父親還是國民黨幹部，錢理群自小就「成分不好」，大學時候就是「右派」了¹，但他一直都是「信徒」，「文革」時候還是參與保衛毛的造反派（錢理群，2008，頁 54-74）。我們不能脫離愛國主義、國族主義來談錢先生對黨的認同。

再向歷史深處挖掘一下就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本質上就是國族主義的。毛澤東在 1944 年 8 月 23 日與美國延安觀察團成員外交官謝偉思（John Service）的會見中說²，

¹ 他在 1994 到 2002 年間才發掘了北京大學 1957 年的五·一九學生民主運動的重要性（頁 312 注 71），而時任歷史系助教的張廣達（1989 年去國），收到（我的）提問「您可以介紹下在北京大學校內的民主運動嗎？」，一下就記起了五·一九作為民主運動的開端，回憶起當時的感受了，見 <https://www.facebook.com/historynccu/videos/505132773759008/>

² 我發現這份材料是源自沈志華教授在關於朝鮮戰爭的講座中曾提到過這次對話。中文版書中日期寫錯了，據英文改正。

我們首先是中國人……中國必須工業化……我們關心的是在建設和生產性的方針指導下，使國家得到最快的發展。首先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需要得到美國援助（Service, 1974, pp. 300-307／羅清、趙仲強譯，1989，頁 253-260）

毛的這些言論，和他建國後的開除「球籍」之論，以及改革開放後的「球籍討論」都一樣反應了中國人救亡圖存、尋求富強的國族主義，很多情況下，其實都沒脫離這個範圍，那麼，這些新國族主義研究到底發現了什麼？石川 禎浩（2016／袁廣泉譯，2020，頁 196）的研究也認為，斯諾在訪問毛後，也發現了「樸素的民族主義要素」，之後更是鐵托（Tito）一般地看待。齊慕實也認為，在投身革命的鄧拓看來，「馬克思主義無論在學術還是實踐上都是能拯救中國的最好的社會科學方法」，而魏昂德（Andrew George Walder）歸納的「共產主義的新傳統主義」，早在建國前就已出現，而且「是中國的而非『共產主義』的」（Cheek, 1998／郭莉、黃新譯，2016，頁 47、120）。不只是共產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一樣明顯，還有其他知識份子，至少社會主義的訴求不能脫離國族主義來看。當然，除了國族主義之重要性，還有更多先前遮蔽的、值得探討的觀念，包括國族主義的一些衍生觀念也是這亟待考察的研究對象。

2018 年創刊的季刊《東方學刊》就十分關注這些問題，第一期就刊登了工業黨相關的論文，兩位作者將其歸納為「主張用工業化程度與社會轉型之間關係的知識體系和處理國家發展和社會治理問題」的鬆散思潮（盧南峰、吳靖，2018，頁 52），第 4 期組了專題「『工業黨』的文化自覺」，第 9 期則有「『入關學』與網絡鍵政話語生產」。這兩種典型「新」觀念的反面似乎是「加速主義」

（accelerationism）；〈中國政治暗語「入關學」與「加速主義」〉，2020 年 8 月 18 日），原是指向的是技術加速，左翼和右翼都能使用，現在被網民用在政治脈絡下，「事情在變好之前，要先變得足夠壞」（譚銳捷，2018 年 1 月 18 日；韋乞，2020 年 7 月 27 日）。

「舊」的觀念，諸如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等也從未離開過。不過，我並不意圖描繪五彩繽紛的觀念之圖，而意在與前後兩節內容並置，考量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互動。

從事網路文學研究的儲卉娟（2019，頁 147-150）分析了龍空論壇（現在是網文作者聚集的論壇）中隨機一個討論帖，作者在帖子中討論一部魔法世界奇幻小說的設定，她發現，作者的「這套客觀知識，看起來是一個疊加了奇幻元素、混合了中學課本的簡化馬克思主義和馬路自由經濟學的知識體系」，

支配著這些討論者的想象世界的……是中國學生最為熟悉的社會客觀規律：自由市場、人權、法律構成現代社會的上層結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科技水平決定經濟基礎；社會經由技術的進化實現進化和發展；進化階段高的社會全面勝過低階段的社會。

儲卉娟（2019，頁 174）認為，

網絡文學的意義恰恰並不是催生高質量的單文本，而是在海量生產與閱讀互相促進基礎上類型的加速進化，以及在進化過程中容納的各種「思想實驗」

第三節 餘皆金錢

國家—社會關係，還有諸種意識型態及作者—讀者的複雜關係，這些對社交媒體研究都很重要，但在我們談論完金錢之前，還不可以講「沒有別的可說了」（The rest is silence）¹。

這種忽視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這個問題真的不重要，另一方面則來自學界的意識，我們在社交媒體的導引性文獻中看不到對社交媒體用戶行動的經濟探討，Levinson

¹ 此處從梁實秋譯，譯文比較可見周兆祥（1981，頁 152）的《漢譯〈哈姆雷特〉研究》。

(2012/何道寬譯, 2014)、van Dijck (2013/趙文丹譯, 2018)、boyd (2014/陳重亨譯, 2015)。

就拿翻牆為例, 既有研究不僅忽視了技術迭代進步間, 國家機器與(自組織的)群眾之間的博弈對壘(「道高一尺, 牆高一丈」¹), 也沒有看到這之間的巨大利益, 一邊是專業研究者也少有染指的技術領域², 另一邊又是網民耳熟能詳的「機場」等詞。據孫麒翔與石飛月(2017年2月6日)引用 Global Web Index 的研究, 估計 VPN 用戶超九千萬³, 這之間的中介地帶正是商機、利潤, 更別提隨之而來醜陋的「抄襲」、「舉報」、「人肉搜索」等行為, 這些故事也該是牆的尚未被講述的一部分(Griffiths, 2019/李屹譯, 2020)。不過, 牆也不是全部, 認為這是阻礙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原因的想法是有問題的, 其中暗含了過多的假設(Taneja & Wu, 2014/蘇超、甘晨譯, 2016)。

¹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04-mainland-greatfirewall/>

² Alphabet (Google 母公司) 旗下的 Jigsaw 開發的 VPN 軟件 Outline 就是基於 Shadowsocks, 見 <https://www.wired.com/story/alphabet-outline-vpn-software/>, 而 Shadowsocks 是中國網民「clowwindy」自己開發與使用的翻牆軟體, 後來開源共享。在 2015 年, 作者被「請喝茶」, 8 月 22 日寫下「Two days ago the police came to me and wanted me to stop working on this. Today they asked me to delete all the code from GitHub.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obey. I hope one day I'll live in a country where I have freedom to write any code I like without fearing.」(作者已改動該條回覆, 刪掉上述內容, 不過, 此訊息已被存檔, 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822223925/https://github.com/shadowsocks/shadowsocks-ios/issues/124>)。目前我們仍然可以看到, 在作者的「shadowsocks-libev」、「ShadowVPN」、「ShadowVPN-iOS」三個倉庫的改動都停留在 8 月 22 日, 倉庫清空僅剩「README.md」一個文件, 不過實際上, 作者並未如其所說應警方要求刪去代碼, 而是改建新的分支「redirection」或「rm」作為倉庫的默認首頁, 而非原來的「master」分支。clowwindy 在 8 月 18 日對另一款 ShadowsocksR (當時尚未開源且不尊重開源協定) 的開發者和這個開發的現象作了大段評論, 「不需要政府造牆, 網民也會自發造牆。這尼瑪連做個翻牆軟件都要造牆, 真是令人嘆為觀止」(見 <https://github.com/shadowsocks/shadowsocks-windows/issues/293#issuecomment-132253168>)。

³ 新華網轉載了這篇《北京商報》的報導, 見 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17-02/07/c_1120421682.htm

而在傳播政治經濟學這一派中，以 Fuchs（2013／羅世宏、徐福德譯，2017）為代表，確實關注了資本財團與數位（免費）勞動者之間的問題。作者—讀者間的關係交往，又極少納入所謂「平台」或「平台資本主義」研究者的視野。Yu & Sun（2020）對微信公眾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確實關注到了媒體帳號的廣告收入，不過，最接近我的研究的仍然是網文，2002 年起就出現向讀者收費支付作者報酬的運營模式了，標準是「點擊和點擊量」，誕生了現在成為主流的「VIP 收費制」，影響巨大，作者讀者間不再需要中介，價格下降擴展了閱讀大眾市場，持續地發表，也即連載變成了「網絡文學『出版』的方式」（儲卉娟，2019，頁 132-134）；在從免費跨入 VIP 收費時，作者—讀者（留下來支持的讀者）間的社會關係就更進一步了，作者需要保證更新頻率、篇幅，而不能半途放棄了，由於網站的設計，讀者不僅可以額外打賞，還可憑「讀者選舉」（選舉權據讀者的消費額）來決定月度優勝，讓作者贏得網站的獎金（頁 164-167、169-170）。此處超常規的打賞反倒是微信文章交換之特色（當然不是全部），也是本文考察的重點，而這又與眾籌不同，是一種免費使用後的回報，一種主動的贈予，也許比較類似的是可以持續為藝術創作者付款的 Patreon，而操作上更像的是營銷裡的想付多少付多少（pay what you want, Kim, Natter, & Spann, 2009），需要結合理論來討論這個問題。

Jhally（1987, p. 69／馮建三譯，1992，頁 117）在研究電視廣告的閱聽人商品時指出，那時的研究（包括批判研究）都只關注了訊息的使用價值，即意義，而這其實「是納入在一套交換價值體系裡的。我們要瞭解使用價值，還需適恰地脈絡化，把它們放入與交換價值的關係之中」¹。媒體報導過一個極端的案例。同樣的以「華商太難了」為標題的文章，在幾十個不同公眾號中出現，調查發現，這些公眾號雖以各國為名，其實隸屬三家公司，都與同一個人有利益關係（朱軒，2020 年 3 月 18 日）。蔡霞（2020 年 12 月 4 日）的文章雖然主要是憤怒，但她作為知情人，也告訴了我們意識型態部門出版書籍可以用來賺錢。即使追溯回文革時期，意識型態內容也無法擺脫利益，如實體性的毛像章（金大陸，2011，第十四章）。

¹ 譯文有改動。

愛國主義、國族主義同樣如此。正像彭麗君在文革藝術研究中指出的那樣，「只要研究它們所設計的生產、流通和接收活動……政治永遠無法徹底壓制經濟」（Pang, 2017／李祖喬譯，2017，頁 59），於是，我們得以在更日常的內容中，看到閱讀、交換、生產的總過程及其各自所處之關係，要怎樣才能做到呢，就是要以一種更寬泛的經濟學方式來看這個問題。

我所選用的文本材料是不同帳號在 2019 年的所有文章，為什麼是 2019 年呢？因為我們在微信官方公佈的年度高閱讀量文章中，發現了政治因素或者說觀點因素的陡然增長，時政相關的文章從前一年的 1 篇大幅增長到 8 篇，而 2020 年則毫無意外地更多了，主要是武漢封城與全球疫病大流行相關的訊息¹。相較之下，更早的 2015 年，則是偏向純粹的娛樂（閻睿悅，2016 年 5 月 1 日），陳至潔（2018 年 6 月 20 日）也發現澳洲華人使用微信公號內容中，「娛樂新聞與搞笑話題」、「房地產與廣告」佔比非常之高。本文不主要討論 2020 年，是因為 2020 年的情況已經埋藏在 2019 年中了，除此之外，2020 年公眾號還突然增多了各種新的功能，如付費閱讀等，還有公眾號推送後微信以算法排序替代時間排序，造成研究上的麻煩。2019 年，其實也有支配性的議題，即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不過這是六月中旬開始在中國的輿論中發酵的，大約歷時五個月終止，這段時間剛好和這一年前面的五個月形成對照，以這樣的方法來看待事件和整體的討論，才能真正像邱林川與陳韜文（2011）所提倡的，進而擺脫一般的新媒體事件研究慣例。

在這裡，我選取帳號樣本時參考的是「新榜」的榜單，以及「西瓜數據」中原創公眾號的榜單，從中挑選最有影響力的公眾號中具有明顯個人特色的（畢竟帳號運營者究竟是不是一個人，無從得知），統一的特徵是發表觀點，除了閱讀人數最多的這些之外，還納入那些發表過最有影響力文章的公眾號，最後入選的是（以筆

¹ 騰訊在 2019 年末一次會議上公開了這份數據，見

https://mp.weixin.qq.com/s/0EJJ07SdVyMb_KnvJcYxUQ。2020 年沒有看到類似官方數據，只有據

「新榜」發佈的「在看十萬加」估算（唯「有理兒有面」這個號的數據有所疑問，不知為什麼，它的「贊」數和「在看」數均有數量級上的差距），見表

<https://shimo.im/sheets/GDyVJYc6yVjkprjX/Z7Ukc>

畫數排列)¹：「九邊」、「大浪淘沙」、「占豪」、「有理兒有面」、「尚磊看市」、「青年大院」（該號在 2020 年下半年註銷，也跟「咪蒙」原因類似）、「後沙」、「烏鴉校尉」、「爲你寫一個故事」、「黃生看金融」、「馮站長之家」、「補壹刀」、「黔線」、「遠方青木」、「蔣校長」、「寧南山」、「緩緩說」、「盧克文工作室」、「tuzhuxi」；要做對比，故同時選了幾家指標性的官媒帳號：「人民日報」、「共青團中央」、「胡錫進觀察」、「俠客島」、「環球時報」。抓取的數量共數萬篇文章，每篇文章抓取的信息包括文章在當天推文中的具體位置、閱讀量、在看量、評論量及評論內容，抓取時要使用微信號，因爲實名制的原因，我只能使用自己的微信號，故是在自己的電腦上從 2020 年 6 月到 7 月的兩月間完成抓取的，使用的程式來自 `github`²。這裡抓取的閱讀量因爲基本上都是十萬加，價值不大，只能以在看數作爲文章影響力的一個參考，我也不會用分詞等方式去切割文本，讓電腦去做理解。後者的方法當然易於研究的重複，但真的更準確，更有助於研究嗎，還是說，更有助於研究的發表呢？我將選取幾篇重要的個人觀點文章，以 Ruth Wodak 的偏歷史性的論述研究方法輔以反思性的研究方法，首先理解進而闡釋其文要義，參考文章評論中其他讀者的思考，還有當時的情境，包括同作者前後數篇文章受歡迎的程度，從而探尋文章在意義生產與交換中的關係與模式。不僅如此，還要將微信文章放在全球的架構中考慮，要如何一個全球的視野中討論這些內容，它是如何與其他國家範圍下的其他文本交戰的。自然，微信是全世界用一個程式（雖然境外版叫 WeChat），不像字節跳動旗下的抖音有間隔開的境外版 Tiktok（Sun, 2021），實質上影響到了離散華人或一切使用中文的用戶（Yu & Sun, 2020），正如之前提及的《紐約客》對「北美留學生日報」的報道，這也不可忽視³。這裡可能出現的問題是選取公號和文章的代表性問題，這和我的

¹ 這裡沒能納入一個很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公衆號「至道學宮」，它在 2020 年五月底被封禁（海陽，2020 年 5 月 26 日）；其作者「白雲先生」本是我想重點討論的人物，很可惜。

² 我將該版本的程式 fork 在此：<https://github.com/JiangPingbo/wechat-spider>

³ 中山大學政治系陳至潔教授在研究這些相關問題，不過暫時未見發表，可參考一次已公開的講座「製造正當性：微信上的中國數位宣傳」，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3nubEv6vrg>

分析一併，都會暴露研究者自己的侷限性或認知盲區。除此之外，僅僅重視這些影響力大的公眾號和文章，就會忽略了一些執拗的低音，爲了避免這種情況，我也將簡要討論它們。

接下來，我將簡要介紹後續章節內容。第二章主要注重理論探討，從理論發展和對話中發現問題，並同時服務於之後的經驗材料討論，但決無意理論先行。第三章以歷史綜合的方法分析中國信息管制體系下的互聯網，在這個基礎上思考微信這個應用和應用中的公眾號文章。第四章以不同的方法同時分析微信文章的內容，文章意義的生產，文章交換中的關係與文章的再生產，並同時以經驗材料與既有理論對話。第五章暫作結，反思微信文章的同時以之前的討論爲基礎，先綜合理論與經驗重構理論，並試圖超越性探討更廣的文化產品問題，提出我的建議，最後，做自我批評。

第貳章 理論

第一節 什麼是意識型態

意識型態在前章所列之研究中，常被拿來描述中國的輿論管控，可是這到底是什麼，又是如何運作的？該如何在基礎（Basis）和上層建築（Überbau）中看待它，又如何可以經濟性質地思考它？

一、意識型態是如何成為馬克思式的

意識型態（L'idéologie）概念來自德·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很多人忽視了這個過程，只在乎馬克思及其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何使用這個詞。

特拉西積極參與法國大革命，但因革命恐怖被投入監獄，正是在那，他轉而研究哲學，在孔狄拉克（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的感覺論（sensationalism）影響下，在 1796 年首次提出「觀念的科學」這樣一個概念。革命後的意識型態要取代舊制度下的「形而上學」，這門新科學包括文法、邏輯等等，他認為，意識型態將取代神學成為科學的王后。他從傳統轉為有機知識份子，自共和四年（1795 年）起任職於革命後新創的國立研究院的道德政治科學部，並將意識型態的觀念推廣至當時的國立中學教育。然而，拿破崙的權力不斷穩固，共和主義傾向的意識型態家就不再受到歡迎，學部和中央學校關閉了，爾後拿破崙甚至將敗退俄國歸罪於意識型態家們（Eagleton, 2007, pp. 63-70）。

這個新詞（neologism）綜合「觀念」與「學」，本義簡潔明瞭，但特拉西不斷為概念拓展疆域，於是，其中一位意識型態家在 1800 年就已指出該概念的空洞。在眾多批判下，意識型態也漸漸轉為貶義。實證主義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

（Auguste Comte）認為這仍是一種形而上學，而馬克思則仍把它歸於唯心主義。實際上，馬克思閱讀的是《意識型態要素》第四卷，並做了摘錄，包含其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在馬克思眼中，特拉西對私有財產的「意識型態」捍衛更加讓這個貶義的概念與資產階級階級利益相聯繫（魯克儉，2016，頁 56；Kennedy, 1979）。

在《德意志意識型態》中，馬克思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兩人的論戰對手青年黑格爾派，就成為他們筆下的意識型態家，其哲學就是意識型態。兩人像笛卡爾（René Descartes）一樣，從我存在、人類存在開始表達這個後來被稱作「唯物史觀」的觀點

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這些個人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行動不在於他們有思想，而在於他們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¹……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MEGA*² I-5: 8／馬恩文集卷一頁 519；孫善豪譯，2016b，頁 10）²

也是在這部分，兩人為意識型態的「虛假意識」論奠定基礎

意識（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有意識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³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MEGA*² I-5: 135／文集卷一頁 525；孫善豪譯，2016b，頁 24）

¹ 這句話在手稿中被刪去，但在下一段又再次表述為「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MEGA*² I-5: 825），並接續引文在省略號後的那一句。

² 馬克思緊接著繼續以此分析了生產和交往的共同演進，見 *MEGA*² I-5: 11／馬恩文集卷一頁 519-520。

³ 在編譯局版本中，這個文字遊戲被譯作「意識……被意識到的存在」，孫善豪（1998，頁 118-119；2016a，頁 xliii-xlv）指出這個問題，馬克思的意思是意識不能離開存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有一類似句子，編譯局譯作「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ein Bewußtes Wesen）」（*MEGA*² I-2: 369／文集卷一頁 162）。曾在編譯局工作數年的魯克儉（2018，頁 218 注 1）認為馬恩全集中文版翻譯「錯誤」不是學界「集體誤讀」的原因，而是結果，「翻譯不可能不受到國內理論界對馬克思思想的闡釋和研究深度的影響和制約，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中國學者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又是受蘇聯哲學教科書直接影響的」。

實際上，德國的馬克思博士是喊著「到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去到大革命後的巴黎（*MEGA*² III-1: 54／文集卷十頁 6），繼而宣稱「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¹開始的地方」（*MEGA*² I-5: 136／文集卷一頁 526）。他和特拉西的論點類似，要以各種實證的科學革舊哲學的命，但此處的斷裂之後，就成為「馬恩找尋這些虛假意識的歷史緣由及運作，賦予其主要的現代意義」（Eagleton, 2007, p. 71）。不過，「虛假意識」這個表述，實際是恩格斯 1893 年去信梅林（Franz Mehring）時的說法，他還指出「推動他的真正動力是他所不知道的」，*MEW* 39: 97／馬恩文集卷十頁 657），在 1890 年回信 Conrad Schmidt 時，他多次稱意識型態為「頭足倒置」（*MEW* 37: 488-495／文集卷十頁 594-601），和此處寫於四十五年前的段落一樣，都是光學隱喻，本義是顛倒，即「虛假」實為錯誤，而非虛無，因為正如其物理學基礎——兩倍焦距以外的光線透過凸透鏡呈鏡面異側的倒立的縮小的實像（即光線到達視網膜，而凹透鏡及平面鏡才會呈鏡面同側的正立的虛像）。

聶錦芳（2018a，頁 619-620）指出，「費爾巴哈」中除了「虛假意識」之外，意識型態還有一種「統治意識」的含義——「幾乎整個意識型態不是曲解人類史，就是完全撇開人類史」（該句在手稿中被刪除，*MEGA*² I-5: 824-825／馬恩文集卷一頁 516 注 2），他認為這個概念在文中一半是表達了這種意義。不過，馬恩的這個觀點仍然是用於對唯心主義的批判上，認為既往的歷史觀統治人，這句話在之後表述為：

¹ 魯克儉（2018，頁 200 注 1）認為馬克思的「實證科學」是指他「自己的理論（特別是後來的政治經濟學），類似於後來韋伯的理解社會學，而有別於涂爾干的實證社會學」。

這些特定的人關於自己的真正實踐的「想象」、「觀念」變成了一種支配和決定這些人的實踐的唯一決定作用的和積極的力量¹。（MEGA² I-5: 48／文集卷一頁 545-546；孫善豪譯，2016b，頁 47）

在「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的表述中，「意識型態觀念」的改動明顯是隨寫隨改的（http://www.online-dif.com/m30_all.html／文集卷一頁 550-551；孫善豪譯，2016b，頁 54），兩人起先也自然地認為這種關係的表現屬於意識型態，但他們馬上就意識到這種表現是直接的，而非倒立的²，這也是先前對觀念和意識型態的區分。而這不能掐頭去尾或絕對化地使用，陳力丹（2016，頁 18-21）點明了其複雜度，³馬恩沒有否認社會其他階級思想的存在，在上升時期，統治階級的思想也可能是進步並反映人民所思所想的；而非統治階級的成員亦可成為統治階級思想的代表，反之亦然。

在這段膾炙人口的話之後，馬恩指出統治階級也分工出一部分「意識型態家」，他們的工作就是要編造出一些統治階級的幻想，「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把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同進行統治的個人分割開來，主要是同生產方式的一定階段所產生的各種關係分割開來」，然後「把所有這些個別的和概念說成是歷史上發展著的概念的『自我規定』」，繼而「把一切唯物主義的因素從歷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憑自己的思辨之馬自由奔馳了」。然後兩人指出「法學家、政治家（包括實際的國務活動家）」就屬於這些意識型態家。當然，在

¹ 手稿中實際為馬克思在左欄寫的「這些特定的人關於自己的真正的實踐的『想象』、『觀念』變成現實的惟一起決定作用的、積極的轉化為本質存在力量」和恩格斯繼續寫的「一般認為這一力量支配（beherrscht）和決定這些人的實踐。」（http://www.online-dif.com/m25_all.html；彭曦譯，2005，頁 52；孫善豪譯，2016b，頁 47）此處引用的是 Online 版（Omura, Kubo, Shibuya, Watanabe, Tairako, & Han, 2019），盛福剛（2021）介紹了這個版本。

² 有趣的是，1919 年「意識型態」一詞最早引進中文就表現了該種混淆，陳溥賢與李大釗自河上肇之日譯將德文 Bewußtseinformen（意識形式）譯作「意識型態」，而將 Ideologie 譯作「觀念（上的型態）」（張秀琴，2018，頁 285-290）。

³ 雖然他的研究主要基於轉譯自俄文的馬恩全集（中文一版）。

這樣意識的鬥爭革命的過程中，馬恩也肯定革命的階級開始「是作為全社會的代表出現的……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确同其餘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¹還有更多的聯繫」，並舉例法國大革命後，許多無產者確實可能得到階級提升。（*MEGA*² I-5: 61-66／文集卷一頁 551-554）

在「費爾巴哈」手稿的最後一頁多一點是馬克思的一些零散的想法（很可能是已經確定無法出版後記下的，因為左欄很少出現馬克思的筆跡；孫善豪譯，2016b，頁 92），「法的觀念。國家的觀念。在通常的意識中事情被本末倒置了」

（http://www.online-dif.com/m72_all.html／文集卷一頁 586-587）。這些想法正是 1859 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的先聲。不過，在《資本論》中則僅留下了拜物教的表述，該部分也脫胎自對各職業（首先是這些意識型態家職業，即法學家等）分工的理解：各職業的手藝與現實的聯繫被認為來自手藝本身，而不是職業分工的社會與人的關係，因為「沒有超越這些關係，所以這些關係的概念在他們的頭腦中也成為固定概念」

（http://www.online-dif.com/m72_all.html／文集卷一頁 586）。對這些法、國家關係的討論，見下一小節。

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

隨著馬克思的文稿一篇篇出版翻譯並進入學術討論，當時在法國文科最高學府巴黎高等師範學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簡稱高師）的哲學教員、法共黨員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就成了關鍵人物。不過，學者的思考自然不能離開現實的變遷。在蘇共二十大及匈牙利十月事件後，阿爾都塞做的正是「保衛馬克思」，從左翼批判史達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矛盾和多元決定（研究筆記）〉（Althusser, 1965/1996／顧良譯，2009，頁 76-107），他引入毛澤東的矛盾觀，葛

¹ 「共同利益」是恩格斯添於右欄的，「主要是同生產方式的一定階段所產生的各種關係」是馬克思添於右欄的（http://www.online-dif.com/m32_all.html, http://www.online-dif.com/m33_all.html／孫善豪譯，2016b，頁 56-57）。

蘭西對機械論的批判，以及恩格斯在 1890 年談「經濟決定論」的信，開始強調上層建築的相對獨立性。在之後的〈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中，阿爾都塞認為，人道主義是意識型態術語，而社會主義是科學的，並對意識型態做了分析，並發現了其「無意識的」特徵

意識型態是具有獨特邏輯和獨特結構的表象（形象、神話、觀念或概念）體系，它在特定的社會中歷史地存在，並作為歷史而起作用……之所以不同於科學，是因為在意識型態中，實踐的和社會的職能壓倒理論的職能（或認識的職能）。（同上引，頁 227-228）

更重要的是，他不認為意識型態僅存在於階級社會中，「人們正是在意識型態中衡量差距、體驗矛盾並『能動地』解決矛盾」（同上引，頁 232），並使用了接力棒和跑道的「結構性」隱喻。

中國文革的爆發更是催生了阿爾都塞對意識型態的進一步思考，1966 年底他就（因與法共態度相悖而）匿名發文提供理論支持，文章發表在「共產主義青年聯盟（馬列）」（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es marxistes-léninistes）的機關刊物上，該組織是剛從法共的「共產主義學生聯盟」（Union des étudiants communistes）中分裂出來的高師毛派團體，後於 1968 年 6 月遭法國總統下令取締。六八風暴之後，阿爾都塞又交出一篇〈意識型態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實為身後出版的手稿《論再生產》（手稿原名「生產關係的再生產」）的縮略版，完整表述他的意識型態理論。

在原研究筆記中，阿爾都塞將法律視為諸意識型態國家機器（AIE）其中之一，並註明它「既屬於（鎮壓性）國家機器，也屬於 AIE 系統」；而手稿中有關法權（Droit, Recht）的兩章則沒有在當時發表。阿爾都塞認為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不是法權，即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使用的是共同「佔有」（Besitz, appropriation），而非「所有」（Eigentum, propriété），或稱「所有權」

（Althusser, 1995/2011／吳子楓譯，2019，頁 145-153、455）。¹他試圖基於其法權理論超越「基礎／上層建築」這一描述性的、地形學式的空間隱喻，意欲以此填補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六冊計劃中的「國家」冊。馬克思的上層建築根植於生產力、生產關係及其市民社會

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黑格爾……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成為我研究工作的指導線索（Leitfaden, guiding principle）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MEGA² II-2: 101／馬恩文集卷二頁 591）

而阿爾都塞還更進一步，認為規定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法律—道德」這一對子主要依靠意識型態而非鎮壓，故屬於 AIE，相比與保障生產關係再生產中統治的「學校—家庭」這一對子，它「**直接保障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運行**」，是一「**把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結合在一起並把上層建築結合進下層建築的特殊機器**」，統治的是「**實踐的意識型態領域**」（Althusser, 1995/2011／吳子楓譯，2019，第十一章）。正因發表的研究筆記中不包含「法權」的討論，他還需在 1976 年為譯文發表作一篇說明（« Note sur les AIE », 同上引，頁 412-433），以回應那些指責他的

¹ 即「在一個集體的、以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社會」（MEGA² I-25: 13／馬恩全集卷十九頁 20）；在馬恩文集卷三頁 433 中，被改為「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吳子楓譯，2019，頁 147 注 2）。我譯作「在一個合作性的（genossenschaftlichen）、生產資料共同財（Gemeingut）為基礎的社會」（部分據萬毓澤，2018，頁 188-189）。

理論為「功能主義」的人，後者沒有看到階級鬥爭恰是該理論的中心（甚至該手稿還有一原計劃但從未寫作的討論階級鬥爭的第二卷）。在說明中，阿爾都塞強調了「**階級鬥爭對於國家機器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功能與運行的優先性**」，並認為「階級鬥爭永遠不會停息」，即使共產黨中，意識型態也要發揮「**粘合劑／水泥**」（*ciment*）¹的作用。這一脈相承自他匿名發表的〈論文化大革命〉，徹底將建造的隱喻變成了建築樓房的隱喻

如果我們要給出意識型態的實體（*concrète*）存在形式，不比作大廈的樓層，比作「水泥」會更好。實際上，意識型態滲透到了大廈每一個房間的每一處……意識型態於一社會中**區分和粘合**不論是技術還是階級區隔。對於整個社會的存在，意識型態是不可或缺的一種客觀現實。
（Althusser, 1966/2014, pp. 14-15）²

在阿爾都塞看來，社會主義國家在完成了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後，仍有「革命／倒退」兩條道路，因此，還需要繼續「**第三種革命：群眾的意識型態革命**」，並且強調了他認為具有創造性的群眾組織（*ibid.*, p. 6）。所以，他將意識型態與行為、實踐、儀式勾連，諸 AIE 規定儀式，儀式支配物質的實踐，觀念即物質的行為又嵌入實踐中，藉此意識型態將人喚問為主體，而這意識型態是物質的
（Althusser, 1995/2011／吳子楓譯，2019，頁 361 以下）。阿爾都塞在遠方的文革和五月風暴以及全球的抗議運動的脈絡下，於諸 AIE 中發現階級鬥爭，發展了這個彌散的、物質性的而又持久處於鬥爭之中的意識型態理論。

即使文革以失敗告終，晚年的阿爾都塞仍堅持自己的意識型態觀點沒有改變（Althusser, 2006, p. 266 ff.），「階級鬥爭可以在……頭腦中進行……決定性的階

¹ 「水泥」的用法也見於葛蘭西，「意識型態致力於鞏固（*cement*）和統一」（Gramsci, 1971, p. 328）。

² 英譯不知何故脫最後一句，此處翻譯參考法文和吳子楓中譯，法文見期刊同期，中譯原文已被刪，轉載見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althusser/mia-chinese-althusser-19661112.htm>

級鬥爭是在意識型態中，從而歸根結底是在哲學本身中上演的」（Althusser, 2005, p. 184／吳子楓譯，2017，頁 119）。其實，早在 1963 年阿爾都塞就邀請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帕斯宏（Jean-Claude Passeron）來高師開一期研討班（原計劃二十小時，只完成八個小時），分享他們對學校和文化的研究，他就試圖「把他們的車廂掛在自己意識型態的快車上」，然而，兩位年輕學者，尤其是布赫迪厄走上了另一條道路（Branchu & Robbins, 2019, p. 16）。意識型態無法經濟化的問題，有望在他那得以解決。

第二節 象徵暴力

一、意識型態及其批判

繼承或批判意識型態理論的著作不在少數，曼海姆將意識型態理論發展成知識社會學時就指認，「任何一個時代的所有各個政黨的思想，都具有某種意識型態特徵……馬克思主義也不例外」（Mannheim, 1929, S. 32／艾彥譯，2001，頁 87）。

汪行福（2011，頁 118）完全將布赫迪厄放在馬克思批判的脈絡下考察，認為慣習是「意識型態概念的唯物主義化」，諸資本的鬥爭則是其「政治化」。我會將其看作是對馬克思有所繼承又有所發揚（Fowler, 2011; Karsenti, 2011）。布赫迪厄大學時「尤其對青年馬克思感興趣，……曾醉心於〈提綱〉」，轉向人類學研究後，又大量閱讀馬克思，關注上層建築「相對自主性」的問題，而他提出實踐理論一樣是要揚棄（aufheben）唯心論、舊唯物論（並認為意識與存在的「反映」理論也是其中之一），〈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一條是一大助力¹（Bourdieu, 1987, p.

¹ 不過我認為是巴黎手稿（即《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寫道，「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唯靈主義和唯物主義，活動和受動，只是在社會狀態中才失去它們彼此之間的對立……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藉助於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絕對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現實生活的任務」（MEGA² I-2: 395／馬恩文集卷一頁 192）。這段中，唯靈論與唯物論的對立沒有問題，馬恩二人在合著中使用過唯心論（即觀念論）這個詞，真正起影

13, 17, 24／陳逸淳譯，頁 26、33、43）。不過，此處正是對話者，年輕的霍耐特（Axel Honneth）博士當時不解之處¹（Honneth, Kocyba, & Schwibs, p. 42），霍耐特在訪談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把布赫迪厄看作是「馬克思主義者」（Honneth, 1984/1990／王曉昇譯，2011，頁 165），而布赫迪厄在對話中則多次批判馬克思主義²（Bourdieu, 1987, pp. 27-29／陳逸淳譯，2012，頁 49-51）；霍耐特一再盤問思想溯源，更偏向馬克思，還是韋伯，布赫迪厄又不願談論（Honneth, Kocyba, & Schwibs, pp. 46-47），而說自己思想來源可以列一張很長的清單。

在當時，霍耐特的判斷並不令人意外，布赫迪厄曾在《再生產》、《實踐理論大綱》等書的題獻中直接引用馬克思，其中明顯地以意識型態的方式考察考試³，在《實踐感》中又指韋伯用唯物論的方式思考了被馬克思歸於唯靈論的領域⁴，是

響還是要到後來新康德學派再次將之與唯物論對立（Jaeschke, 2000，轉引自 Heinrich, 2018/2019, p. 156）。

¹ 這次對話 1985 年 4 月於巴黎完成，1986 年以德文發表，英文翻譯發表，不過與收入《所述之言》（*Choses dites*）的文本出入較大，期刊版中見不到一些布赫迪厄對馬克思主義的評論，書中將採訪者的提問大大精簡，所以此處同時參考對照英譯（很可惜，這不是我要探討的重點，對話內容的象徵爭奪，這個還挺重要的問題我就無法繼續推進了）。

² 馬克思自己是與馬克思主義撇開關係的。聶錦芳（2018b，頁 6-7）參觀了位於德國特里爾的馬克思紀念館（原為故居），他將展覽材料歸納為「馬克思晚年特別警惕他的學說以後會淪為政黨政治鬥爭的工具和佔統治地位的『國家哲學』，認為那樣會『窒息精神創造的本質』，並且舉例說黑格爾哲學就是這樣衰落的」。馬克思在信中寫道，「把馬克思主義壟斷化並使它成為一種國家宗教，就意味著卡爾·馬克思精神的死亡，而這種精神正是他畢生研究和生活的靈魂之所在」（Museum Karl-Marx-Haus Trier, 2013, S. 75，轉引自聶錦芳，2018b，頁 436）。

³ 如對考試這種「社會神正論」的解釋，「一種社會方面的不平等變成了一種純粹是學校方面的不平等，即變成了在學校裡掩蓋並促進進入最高層次教育機會不平等的一種「水平」或成績方面的不平等」（刑克超譯，2002b，頁 171）

⁴ 韋伯在基督新教倫理研究的結尾反對單一的「片面的唯靈論的（spiritualistische）……同樣片面的『唯物論的』」的解釋（MWG I-9: 424／康樂、簡惠美譯，2007，頁 226-227）。雖然韋伯深受新康德派的影響，但在那個年代，他仍然作出公允的評價，畢竟恩格斯晚年都（在我前引書信中）痛斥那些「唯物論的」研究。

一種「廣義唯物論」（Bourdieu, 1980, p. 34／蔣梓驊譯，2003，頁 26），不難看出，他更進一步地將這用到了社會與文化領域（朱國華，2016，第三章），同時不乏批判。

布赫迪厄在和夏蒂埃對話時，自陳「佔統治地位的文化是統治階級的文化」「大致是正確的」，不過他的「全部研究都反對這句話已經表達和沒能表達的意思」，並說「我 90% 的研究都是反對意識型態概念的」（Bourdieu & Chartier, 2010, p. 36／馬勝利譯，2012，頁 39）。他在和伊果頓的對話中，用了信念（doxa, δόξα）來代替，「我們接受許多事物而不需瞭解它們，這就是被稱作意識型態的東西」（Bourdieu & Eagleton, 1992/1994, p. 267／方傑譯，2002，頁 352）。信念，與成問題的意見領域（域內包括正統與異端）相對，是「不能質疑和所有行為者都通過行為遵守社會習俗的方式同意其現狀的」（Bourdieu, 1972/1977, p. 168 figure; Bourdieu, 1972/2000, p. 240／高振華、李思宇譯，2017，頁 199）。他雖認為 AIE「無疑不可忽視」，但也「不需要這樣一種故弄玄虛的行動」，他認為，不能用意識、虛假意識等來思考，需要關注身體，因為象徵權力「帶來持久的身體轉變……與長期的秉性」¹，故而，他試圖以象徵暴力（violence symbolique）等概念來取而代之²（Bourdieu, 1997／劉暉譯，2009，頁 197-199；Bourdieu & Eagleton, 1992/1994／方傑譯，2002）。

布赫迪厄最早是在《再生產》中建構出「象徵暴力」概念的³，此概念「在社會的各種再生產的過程之中，扮演了一個關鍵性的角色，堪稱其理論體系中最重要

¹ 譯文有改動。

² 相比理論著作中的晦澀寫作，對話時的布赫迪厄要清晰得多，尤其是他與伊果頓兩人 1991 年在倫敦的新書與談會（即 Eagleton（2007）的第一版和布赫迪厄的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中文版譯自法文，副標題作「語言交換的經濟」），他回應伊果頓，直陳不喜歡「阿爾都塞的貴族化的思想」，並認為意識型態概念需要更新，「首先，要更準確，其次，要使之更具活力」（Bourdieu & Eagleton, 1992/1994, p. 267, 266／方傑譯，2002，頁 352、350）。

³ 《再生產》只是 1964 年出版的暢銷著作《繼承人》的理論化（可以說是糟糕地用了高師畢業生的寫法），在這本「五月風暴」時期的重要讀物中，兩位作者就已經更清晰地表述了觀點。「不平等

的概念工具之一」，他的問題意識來自人生經歷，指向的是「正當的暴力」，首先就是教育與高雅文化（Bourdieu & Passeron, 1970／刑克超譯，2002b；陳逸淳、黃敏原，2019，頁 53、56-61）。

布若威（Michael Burawoy）直接指出「象徵暴力」相對「慣習」（habitus）等概念沒有得到應有重視，前者實為布赫迪厄著作的核心（2019, pp. x, 2）。他批評稱，

資本、場域和慣習的概念工具箱毫無疑問是布赫迪厄吸引人之處，但這不是理論，而是一套框架概念，可以應用到幾乎任何問題，它讓平庸的研究披上了精巧理論之身份、表象。運用這個工具箱就有效地避開了那些處於象徵暴力理論核心的棘手議題。而這與美國社會學的實證傾向相迎合。（p. 15）

Wacquant & Akçaoğlu（2017, p. 45）¹在這點上也持類似觀點，認為核心不在耳熟能詳的布家「三字經」，社會空間和象徵權力才是根本。他早年也就布赫迪厄—霍耐特對話為依據，來分析布赫迪厄的象徵暴力與馬克思的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布赫迪厄發現，「在某些界限上，象徵結構擁有某種（哲學與政治理論的意義上的）構成的超凡力量；過去人們相當低估了這個力量」（Bourdieu, 1987, p. 29／陳逸淳譯，2012，頁 51），這其實正是前述與虛假意識相對的統治意識。

Wacquant（1993）認為，布赫迪厄不認同的是馬克思理論中直接和對應的作用，而是注意到了兩面的作用。

的社會因素的作用巨大，它可以使教育制度在經濟條件平等的情況下，把社會特權轉化為天資或個人學習成績，從而不中斷地維護不平等。表面的機會均等實現得越好，學校就越可以使所有正當外衣服務於特權的正當化」（Bourdieu & Passeron, 1964/1985／刑克超譯，2002a，頁 31）。

¹ 布若威前述書就源自他在 Wacquant 的伯克萊研討班上的讀書筆記（Burawoy, 2019, p. 8 ff.），而 Wacquant & Akçaoğlu（2017, p. 43）交代布若威還想再上第二次，並對他的演講題目 Who is Afraid of Pierre Bourdieu?略有不滿。

它通過提出思想秩序、借助思想並針對思想的行動秩序，傾向於遺忘維護象徵秩序的一種最強大機制，即源於社會性被納入事物和……身體之中這個事實的**雙重自然化**，以及源於自然化的象徵暴力作用。（Bourdieu, 1997／劉暉譯，2009，頁 213）

Wacquant（1993, p.133）也不時引葛蘭西作為對照，將布赫迪厄理論以葛蘭西的話概括為，「領導權¹是在意識和論述的層面下得以製造的」。

象徵暴力是通過被支配²者的接受（*accorder*）才建立的這種強制，被支配者必定只能對支配者（因而對支配）予以接受，當他為了思考支配者和思考自身甚或為了思考他與支配者的關係，只擁有他與支配者共有的認識工具時，這些認識工具不過是支配關係的結構融入身體（*incorporée*）的形式，卻使得這些關係顯得自然而然（Bourdieu, 1997／劉暉譯，2009，頁 200）

二、人，象徵動物

布赫迪厄堅持自己不是在「做理論」，自認「社會科學專業中最經驗研究的之一」（Wacquant & Akçaoğlu, 2017, p. 40; Bourdieu & Grenfell, 2019, p. 9），他自己在晚年多次舉的例子就是性別。

¹ *egemonia, hegemony*，源自 *ἡγεμονία*，譯作領導權（田時綱，2007；展江、彭桂兵，2011）、霸權、領袖權（張歷君，2020，第一章）、統識、最有說服力的統治性的意識型態（齊慕實譯，郭莉，2016，頁 x）。Perry Anderson（2017, chap. 9n33）在專論該詞的書中尤其不同意田時綱這個中文翻譯（該書前言中他說中文部分承王超華、章永樂幫助）。

² 與前文「統治」同義，*Herrschaft* 或 *domination*，不過「統治階級」等已成定譯，不過馬克思未把這個字當作問題來研究，而韋伯則關注對支配的爭奪，故被問題化的這個概念譯成「支配」更合適。不過，也不能忽略其中的關聯。韋伯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演講中提出這個定義之前，說道，「『每個國家的基礎都在於武力』，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如是說。這在事實上完全正確」（*MWG I-17: 158*／錢永祥譯，1985/1991，頁 171）。

布赫迪厄認為，在身體和秉性之下，這種「統治關係……尤其依賴一個象徵財貨（*biens symboliques*）市場的結構」，他以自己早年對婚配的人類學研究發現，女性「只作為物品甚或象徵（*symboles*）」服務於男性與整個集團的象徵資本，不過，他又同時反對純粹的符號學和經濟論的解釋，認為作為其基礎的象徵財貨經濟（*l'économie des biens symboliques*）具有「基本的曖昧性」，交換形式不是商品而是禮物（Bourdieu, 1998/2002, p. 64-67／劉暉譯，2017，頁 58-61）。在婚配之外，台灣漢人喝花酒的研究也很好地展示了這個理論（黃淑玲，2003）。

我們不能把象徵資本與布赫迪厄筆下的其他資本混起來，雖然他總是拒絕定義，不嚴謹地使用術語（Bourdieu, 1983/1986; Neveu, 2018），但相對於其他資本，象徵資本更重要，因為它「完全建立在正當性的理論上」，後者又藉此確保了「整個迴路的完整性」（Fabiani, 2017／陳秀萍譯，2019，頁 170）。象徵權力，即「其他形式權力的轉化」（Bourdieu, 1977/1979, p. 83），正如

所有形式的資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傾向與象徵資本相同的方式來運作……象徵資本……並非資本的某一形式，而是所有形式的資本最終都將變成的樣子（Bourdieu, 1998, p. 347，轉引自 Fabiani, 2017／陳秀萍譯，2019，頁 170-171）

他認為自己的「象徵資本」概念「給予韋伯用卡理斯瑪（*charisme*）這個詞所表明的東西一個嚴格的意義……是涂爾干學派稱之為瑪納（*mana*）的等同物」（Bourdieu, 1996／譚立德譯，2007，頁 167），用他自己的話來理解這句，即他用唯物論處理了莫斯（Marcel Mauss）以唯靈論分析之處。若回溯過去，其首部著作 *Sociologie de l'Algérie* 「已有**象徵資本**這個概念……這是我著作的中心想法」（Bourdieu & Grenfell, 2019, p. 8），在 1960 年所寫的論文〈名譽的含義〉中，這個想法就成型了，他寫道，「名譽（*honneur*）上的比拼和對象徵利益（*profit symbolique*）最大化的訴求掩蓋了對於物質利益最大化的訴求」，進而在收入《實踐理論大綱》中尋求「建立一種象徵利益的總會計學」（Bourdieu, 1977, p. 60, 370／高振華、李思宇譯，2017，頁 48、306）。

歷史地看，只有在貨幣作為萬物尺度之後，象徵才會作為其反面出現，是「無償的，亦即無利益的（*désintéressées*），也是無用的」，因為象徵資本就是「被否認的資本」（Bourdieu, 1980, p. 200／蔣梓驊譯，2003，頁 186），繼而，象徵資本難以測量計算，擁有的集團自然小心翼翼，不願有一絲一毫的損失，從這個角度看，它又是「最廣義的信用，即只有集團能為集團提供最多物質和象徵保證的人提供的一種預付款」，炫耀它，即消耗它，反倒有助它的實現、增殖和認可（Bourdieu, 1977, p. 370／高振華、李思宇譯，2017，頁 306）。

本質上，象徵資本來自禮物交換中的時間延宕，它「切斷饋贈和回贈之間的關係，使得這兩個完全對稱的行為顯得像是單獨的、毫無關聯」，畢竟「立即回贈完全一樣的東西顯然無異於拒絕」（Bourdieu, 1980, p. 179／蔣梓驊譯，2003，頁 166），這就建立起一種「以來往、認識與承認並感激為基礎的支配關係」（Bourdieu, 1996／譚立德譯，2007，頁 155、164），這種時間作用掩蓋了這種關係，又因其延續而完成了既有關係的再生產（*travail de reproduction des relations établies*），參與競技¹（*jeu*）其中的個體和集團，承認這套操作的同時，又「制度化地組織和保障了無認（*méconnaissance institutionnellement organisée et garantie*）」（Bourdieu, 1972/2000, p. 349／高振華、李思宇譯，2017，頁 289-290）。這樣，布赫迪厄就回答了莫斯之問²，即為什麼「這些所謂的自願的呈獻，表面上是自由

¹ *jeu* 一般譯作遊戲，不過相比洪席耶處的遊玩含義，布赫迪厄的使用更似競技（廖育正，2019），一是其理論自莫斯的夸富宴（*potlatch*），二是因為他自己的論述，「社會競技，經濟競技，同樣還有文化競技……不是公平競技……類似一種持續數代的障礙賽跑或每個競技者擁有他的所有前人的積極或消極成果也就是他的所有祖先的合併成績的競技」（Bourdieu, 1997／劉暉譯，2009，頁 252），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前些年的一款電腦遊戲「中國式家長」，也許正是因此，《國家精英》中 *espace de jeu* 更好地譯成了「競技的空間」（Bourdieu, 1989, p. 375／楊亞平譯，2018，頁 457）。

² 這成為法國學界的一大問題（謝晶，2019，第八章），布赫迪厄就遭到的 Alain Caillé 及其領導的社會科學反功利主義運動（*Mouvement anti-utilitariste en science sociale, MAUSS*）的反對，謝晶（頁 196 注 2）指 Caillé「只是將那個莫斯式的問題原封不動地變成了答案」。

的和無償的，但實際上確是強制的和利益交關的」（Mauss, 1923-1924／汲喆譯，2019，頁5）。

三、承認

除了可以看出一種「**關係本體論**」之外（Wacquant & Akçaoğlu, 2017, p. 43），類似於馬克思，我還發現，布赫迪厄與阿爾都賽均使用

「reconnaissance/méconnaissance」這一組概念來闡述意識型態或象徵暴力的機制。阿圖賽自陳該說源自拉岡（Jacques Lacan，拉岡也受莫斯影響），爾後他又發現其實來自馬克思，是在「包含了一種實證主義—機械論的意識型態觀，即一種還不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型態觀」的《德意志意識型態》中的「一些驚人的提法」（吳子楓譯，2019，頁338）：

希望大家能允許我吐露一點個人隱情：……拉岡曾把「承認／誤認」運用於無意識，我重新採用了他提法中的這兩個詞，把意識型態的功能定義為「承認／誤認」（reconnaissance/méconnaissance）。可是在我費勁地把這個定義陳述出來幾年之後，卻「發現」這個提法一字不差地早就出現在《德意志意識型態》中了（吳子楓譯，2019，頁339注2）

除此之外，這一組概念在引入中文時，還有翻譯的問題，也許是因為學術背景，也許是因為轉譯的原因，中文有多種表達，且仍處於爭執之中。我贊同編譯局「承認／不瞭解」譯法¹，但我有時也會依脈絡譯作「無認」或「沒認」，具體情況可見下表。

¹ 「費爾巴哈」手稿中為恩格斯補充在右欄，「費爾巴哈既承認現存的東西同時又不瞭解現存的東西」（http://www.online-dif.com/m28_all.html）。翻譯上，reconnaissance 還有感激的意思；而吳子楓（2019，頁556注1）指出英譯本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所附的〈意識型態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仍沿用 Ben Brewster 的 1971 舊譯，未作修訂，文章末尾「ideology=misrecognition/ ignorance」（Althusser, 1995/2014, p.270）的錯誤綿延半世紀仍未改正。

表 2：承認／不瞭解（無認）的原文、英譯與中譯

作者	使用與翻譯
馬克思	Anerkennung/Verkennung (<i>MEGA</i> ² I-5: 57) acceptance/misunderstanding (<i>MECW</i> 5: 58); recognition/miscognition (Carver & Blank, 2014, p. 156) 承認／不瞭解（文集卷一頁 549）；承認／錯認（孫善豪譯，2016b，頁 50）

表 2（續）

作者	使用與翻譯
阿爾都賽	reconnaissance/méconnaissance (Althusser, 1995, p. 206) recognition/miscognition (Althusser, 1995/2014, p. 173n3) 承認／誤認（吳子楓譯，2019，頁 338）
布赫迪厄	reconnaissance/méconnaissance recognition/miscognition 承認／無知（陳逸淳、黃敏原，2019，頁 61-62）承認／不識（蔣梓驊譯，2003，頁 177）承認／不瞭解（譚立德譯，2007，頁 165）承認／不知（高振華、李思宇譯，2017，頁 289）

注：資料來源已列表中。

「承認」¹一詞最重要的來源其實是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而在藉此曝得大名的 Fukuyama（1992/2006／區立遠譯，2020）的同時，霍耐特也在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指導下，在他的教授資格論文中從耶拿（Jena）時期的青年黑格爾處發展了一種承認理論，繼而成爲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的代表。

黑格爾批判了霍布斯的政治理論，他從愛中得出了承認，即雙方都「在他者身上認識自我」，霍耐特將其引伸爲

如果個體不承認互動夥伴也是一個個人，那麼他也就不能完全地、無限制地把自己明確爲一個個人……互惠的義務在一定程度上發展爲這麼一種義務關係，它要求但不強迫主體在一定意義上彼此承認（Honneth, 1992／胡繼華譯，2005，頁 44）

霍耐特藉助心理學研究，發展了三種承認形式：愛、法權（Recht）、團結。不過，我們顯然不能簡單將布赫迪厄的承認與霍耐特對立起來（Carré, 2019），並且布赫迪厄確實也用過「承認資本」之類的詞，但這並不意味着要融合兩人來創造新概念（Piroddi, 2020）。對支配關係的承認，歷史地看，是存在於支配社會中的，主體間的承認將有機會打破個體、集團互相之間長久的支配。若回顧兩人對話，布赫迪厄曾說：

由於以承認為目的的鬥爭乃是社會生活的一個基礎面向，而鬥爭的重點乃是在於一種獨特的資本形式的積累，也就是在聲望、威信的意義下的榮譽；於是，也就有了一種累積象徵資本的特殊邏輯。象徵資本就像是一

¹ Anerkennung 一字在之前沒有成爲受關注的哲學問題，如 Joachim Ritter, Karlfried Gründer, Gottfried Gabriel 編輯，1971 年出版的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第一卷中竟然沒有收錄此字；不過，Wolfgang Fritz Haug 編輯，1994 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考證大辭典》（*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第一卷中收入該字（S. 249-261／俞可平等編譯，2018，頁 216-226）。

種以知識與承認為基礎的資本（Bourdieu, 1987, p. 34／陳逸淳譯，2012，頁 58）

在布赫迪厄以「象徵財貨經濟」為題的課程¹中，就回憶起自己曾（在《實踐理論大綱》中）「年輕氣盛地（無知地）說過……社會學的作用就是構建一種實踐經濟學的一般理論」（Bourdieu, 1996／譚立德譯，2007，頁 154），這也就是他「多年來努力建立的象徵財貨經濟的唯物主義理論²」（Bourdieu, 1998/2002, p. 54／劉暉譯，2017，頁 46）。他承認「是韋伯之天才，方能將經濟學邏輯引入象徵財貨經濟」，並認為，此「市場」非經濟科學的「市場」，而是「諸場域的一般理論之一範例」，「從經濟學式的經濟到宗教的經濟學，這種韋伯式的隱喻應用，只有在此情況下方為可能」，於是，經濟行動者、經濟法則都需要重新考慮了（Bourdieu & Grenfell, 2019, pp. 15-16）。這其實也一脈相承自法國的非經濟主義傳統，莫斯的《禮物》是一例，Latour & Lépinay（2008／陳榮泰、伍啟鴻譯，2017）介紹的塔爾德的經濟學裡要求的多元計量方式，Bourdieu（1984/1992／李沅沅譯，2019，附件一）就是一個範例。不過，拓寬計量方式之後，也不能僅依數字大小定奪，那就又犯了經濟主義之錯。

¹ 1993-1994 年，他還在法蘭西公學開了同名課程，目前尚未出版，但可見簡要：

https://www.college-de-france.fr/media/pierre-bourdieu/UPL8600735440192557655AN94_bourdieu.pdf

² 布赫迪厄在 1977 年 9 月 7 日曾去信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我懷著極大興致讀了您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非常贊同您……我在這裡感到如此孤立，這種贊同就顯得更加神奇」（Jackson & Rivetti, 2020, p. 216）。而 Bourdieu 的英譯本也是由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的（Fowler, 2011, p. 36）。

第三節 回啟經濟學¹

一、馬克思及其後

馬克思沒能完成《資本論》的寫作，留下諸多疑問。經濟學批判應當引來更多的思考與批判，而不是要去「比馬克思本人更理解馬克思……爭奪對《資本論》正當評論的壟斷……以馬克思主義……代表的巨大象徵資本為賭注」（Bourdieu, 1982／褚思真、劉暉譯，2005，頁 172-173），要將馬克思的學說和後人的闡釋看作基礎，構築新的「上層建築」。而要繼續對此時此刻的分析，不能離開的就是生產與物質性的問題。

渡辺 雅男（2019）從日本移師中國，也把日本學界之「服務勞動的生產性論戰」帶進了中文世界。渡辺 雅男、賈利軍與高晨曦（2019）把第三產業分為消費服務、生產服務和公共部門，就算都受到僱傭，也只有發生在直接生產過程的勞動才算是生產勞動；並把消費服務中的剝削看作是消費領域的「二次剝削」，即生產領域的「本源剝削」之後勞動者的薪水在儲蓄和消費中受到的剝削（渡辺 雅男、高晨曦，2019）；把非物質生產部門視作精神生產部門，如：傳媒產業是以非物質勞動的成果來販賣其物質生產內容的，而廣告產業則是「為了節約流通費用的追加費用」（渡辺 雅男、高晨曦，2018，頁 18-20）。

馬克思對生產勞動的定義是「直接創造**剩餘價值**的勞動，也就是使資本**價值增殖**（*verwerthet*）的勞動」（MEGA² II-4.1: 109／馬恩全集卷三八頁 124），對這個定義也許會有不同的理解，不過他就「**同一內容的勞動**可以是生產勞動，也可以是非生產勞動」這個論斷舉的例子其實更為清楚，作家創作、歌手演唱都只是作為交易者的非生產勞動者，而受書商指示編書的作家、營利性劇院僱用的歌手，因為資本得以增殖，都是生產勞動者（這部分馬克思留下了稍有不同的前後兩份手稿

¹ 據悉，Dan Shiller 認為自己的書 *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 應該翻譯成「從勞動出發」，但譯本已經印成「回歸勞動」，簡體版也未作改動。

¹，參卷三七頁 332；II-4.1: 113／卷三八頁 130）。在這裡，馬克思其實同時處理了兩個問題，生產與非生產勞動、物質與非物質。不過，後者可能在馬克思看來不算是問題，此處也暫且按下不表，在之前的「剩餘價值手稿」中，他也曾指明，

作家所以是生產勞動者，並不是因為他生產出觀念，而是因為他使出
版他的著作的書商發財，或者說，因為他是一個資本家的僱傭勞動者。
（卷三十三頁 143）

馬克思之後也解釋了為什麼這不是他著作討論的重點（至少在那個時候沒有問題），

不過，就形式來看，大多數這樣的勞動幾乎還不是在形式上從屬於資本，而是屬於過渡形式。

整個說來，這樣一些勞動，即只能作為服務來享受，不能轉化為與勞動者分開的、從而作為獨立商品存在於勞動者之外的產品，但能夠直接被**資本主義剝削的勞動**，——這些勞動同資本主義生產的大量存在相比是微乎其微的量。所以，可以把它們完全撇開不談（卷三八頁 130）

彈指一揮七十年過去，班雅明第一個接起這個問題。著名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²有三稿，第一稿完成於 1935 年，1939 年的第三稿是現在通行的版本，而第二稿才是當時發表的版本，以法文發表於 1936 年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刊

¹ 這部分是 1863 年 1 月《資本論》第一冊提綱中的部分（MEGA² II-3.5: 1861-1862／馬恩全集卷三十六頁 313），〈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在 1863-1865 手稿中作第一冊最後一章。在先前的中文版本中為《剩餘價值學說》第一冊的附錄，在我引用的這些例證之後，編者加了一個小標題「（e）非生產勞動是提供服務的勞動。資本主義條件下對服務的購買。把資本和勞動的關係看成服務的交換的庸俗觀點」（馬恩文集卷八頁 406），1910 年考茨基版第一卷附錄〈生產勞動的概念〉沒有列一個小標題，另可比較依手稿排印的對應部分 MEGA² II-3.6: 2173／馬恩全集卷三十七頁 332。馬克思的服務與現代服務業明顯不同。

² 「複製」也就是「再生產」，也同時是「繁殖」。

物上，內容有所刪改，去除的不僅限於那些政治性表述（那是所長霍克海默一直堅持的，見 Wiggershaus, 1986/1995, p. 210／孟登迎、趙文、劉凱譯，2010，頁 278-279）。

同時在 1935 年，他也在向研究所申請補助他的拱廊研究計劃，阿多諾先站到了他這邊，去信霍克海默，幫腔稱他「試圖運用作為辯證的『商品』概念把 19 世紀當作一種『風格』進行研究」，霍克海默被說服了，去信本雅明稱

您正在取得極大的進展，以超越此前對審美現象的唯物主義解釋……

您不是在生產過程的形式及其總體趨勢中，而是在具體細節中借鑑了經濟因素（轉引自 Wiggershaus, 1986/1995, pp. 194-195／孟登迎、趙文、劉凱譯，2010，頁 260-262）

在班雅明的第一稿第八節中，他指出希臘藝術的永恆性來自技術上的不可複製（希臘時代，只有硬幣和陶器可複製），對電影這樣的複製藝術重要的「藝術創作的可改善性（Verbesserungsfähigkeit）」在希臘那卻無足掛齒。在班雅明看來，「每個現代人都具有被拍進電影的要求」，這種平等觀也反映在他的作者觀中，新聞業的發展擴展了讀者群，進而擴展了作者群，而現代勞動分工的專業化又使得每個人都在一個小領域成為內行，「區分作者和讀者就開始失去了根本意義……勞動本身得到了文字表達……從事文學的權力不再植根於專門的訓練中……文學成了共同財（Gemeingut）」（Benjamin, 1980, S. 446, 455-456／王才勇譯，2006，頁 67、81-82）。

在第一稿中，班雅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更為銳利，「電影資本把這種大眾主宰性的革命可能轉變成了反革命的可能」（同上引，S. 451-452／頁 76），複製藝術被用於價值增殖。這方面看，阿多諾是「第一個亦是唯一的追隨者（disciple）」，鄂蘭（Hannah Arendt）此言不虛，但同時阿多諾也認為班雅明是「非辯證的」，不區分基礎與上層建築（1969, p. 2, 10／王斑譯，2008，頁 22、30）。

阿多諾當時就發表論文，對班雅明作進一步回覆，他自然先是用馬克思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來分析最拿手的音樂，從商品化了的音樂中發現「在文化財貨領域，交換價值以特別的方式表現」¹，也即正好來自這種「純粹使用價值的」、「直接性的幻象」（Adorno, 1938/1973, S. 25／夏凡譯，2020a，頁 223），他一方面同意音樂的接觸面更廣了，但也認為「音樂拜物教的對應物是聽覺的退化」，「聽覺主體不僅失去了有意識的音樂認知的能力，這種能力一直侷限在一個狹小的群體中；而且他們反而拒絕這一認知的可能性」，同時他也敏銳地發現了，「通過傳佈機制（Verbreitungsmechanismus），尤其是廣告，退化的聽覺明顯與生產相關」（同上引，S. 34-35／頁 229-231）。

在 1942 年寫的對大眾文化的分析（Adorno, 1981／夏凡譯，2020c），以及改寫後成名的「文化工業」論中，阿多諾也會提到大眾文化的壟斷，不過，其中亦有經濟分析方法，李乾坤（2016）提示了這點，他爲了向中國學界引入由多位阿多諾的學生開闢的「新馬克思閱讀」（Neue Marx-Lektüre）這個學派，不忘在《啓蒙的辯證》（*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中尋根摘句，歸功於此。其實，〈文化工業〉一文明顯有《資本論》分析方式的印跡（Horkheimer & Adorno, 1969／林宏濤譯，2008），多年後重提此文，以英譯「重思」（reconsidered）著稱，阿多諾重申了先前提及的內容，這個「工業」是指「事物本身的標準化……與傳佈技術（Verbreitungstechniken）的理性化，而不是嚴格限定在生產過程的標準化上」，「大眾」則是「文化工業的意識型態」，這個關鍵的名稱，就是爲了「最大限度地把文化工業與通俗藝術區別開來」。而他也直接對話班雅明，「文化工業尋找意識型態的支撐，正是爲了小心翼翼地抵禦著其產品中包含的技術的全部潛力」，並以靈韻的視角定義文化工業爲「一層晦暗薄霧（vernebelnden Dunstkreis），保持著已經消逝的靈韻」（Adorno, 1967/1977, S. 337-340／夏凡譯，2020b，頁 286-289）。

嘗試融合兩人的是米埃及（Bernard Miège, 1989），他對文化產品的分類標準是可複製與僱傭勞動，開始是分作三類，後來又加上了一類「諸如獨特藝術品那樣

¹ 譯文有改動。

落在文化產業之外的」(Miège, 2011, p. 86)。而且他關注到了創作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中介人(布赫迪厄稱之為文化商人)，*éditeur* 作為生產者的作用。米埃及的這個觀點可在儲卉娟(2019)的網文研究，及她對出版社中試圖引進日本武士劍俠小說這一工作經歷的反思中得到支持與批判，營利網站僱傭編輯與管理人員，

原本只是作為單純熱帖指標的「點擊量」，被逐漸注入商業色彩，寫作者出於個人「虛榮」對點擊量的追求，經由網站利益的轉換，被納入商業利益取向的軌道。(頁 118)

如果被想象的生產和閱讀之間的唯一通道的出版業，在本質上並不在乎這個溝通，也無力促進生產，只不過是一個將既有的生產力包裝成人們希望的樣子從而讓自己生存下來的掙客，那麼，誰才能夠激活那些真正沉睡在人們內心深處的嚮往，回應並匯聚成為真正的時代「意識型態」？(頁 279-280)

米埃及後來加入了另一種持續性的模式「流」，可惜，不及時代變化快，所以，我們還要研究文化產品和產業(劉海龍，2015)，再融合經驗材料的討論在第五章再次回到這個問題。

二、藝文世界

在文化工業的討論中，Hesmondhalgh (2019, p. 6／張菲娜譯，2016，頁 4)選擇用「象徵創作」(symbolic creativity)來代替藝術，用「象徵創作者／製作者」(symbol creators or symbol makers)來代替藝術家¹。這樣的定義試圖確定研究範圍，而藝術殊難定義，我也不會試圖定義之。不過，我認為，洪席耶的想法可引為以下討論的基礎。他比班雅明的政治與審美討論更進一步：「政治(la politique, politics)就是可感的分配」(可感 sensible，有時也作美感 aisthesis)而且法文「分配」(partage)同時是共享與分隔(Rancière, 2000/2013, p. 7)；政治事物(le

¹ 原文加粗並斜體，此處不必。

politique, the political)¹與其相對，後者的本質是歧義 (mécontentement, disagreement)，是「透過建立一個在根本上極為異質的假定，亦即，無分之分 (part des sans-part)，破壞治安秩序的可感分配」，(Rancière, 1995, pp. 20, 53／劉紀蕙、林淑芬、陳克倫、薛悉平譯，2011，頁 19-20、63)，故而「不能被等同於交往行動」(Rancière, 1998／姜宇輝譯，2007，頁 129-132)。

雖然，文化產品或象徵創作自然和其他產品不同，經濟科學在這方面做出的嘗試，仍然值得肯定。David Throsby (2001／張維倫、潘筱瑜、蔡宜真、鄒歷安譯，2003) 區分了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在他看來，藝術家的勞動時間分配在藝術／非藝術市場，而且，藝術品也不止於實質商品市場，還在概念市場上流通。藝術品的投資收益率低，不同藝術品的收益率差距明顯 (Frey, 2000, chap. 10／蔡宜真、林秀玲譯，2003，第十章)。其中最重要的是，Baumol & Bowen (1966) 發現，生產力的提高無法降低表演藝術的成本，這一類型的服務有一「成本病」(cost disease)。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隨資本主義的發展，商品不再是簡單的堆積了，而是各式各樣、美輪美奐的擺放、造型，充滿美感了，甚至美感本身也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相統一」的一部分了 (Haug, 1971/2009／董璐譯，2013；Assouly, 2008／黃琰譯，2013)。

布赫迪厄不只有對文化的調查分析，他的藝術研究也是象徵理論的基礎，「藝術家的資本是一種象徵資本，沒有什麼比智力鬥爭更像卡比爾人之間的榮譽之爭了」(Bourdieu, 1996／譚立德譯，2007，頁 179)。

象徵財貨經濟理論在 Bourdieu (1977/1980, p. 263) 的一項實證研究中第一次完整呈現²，是為《藝術的法則》之先聲。他指出，藝術沒有反駁馬克思的勞動價

¹ 這是洪席耶做出的區分，陰性的政治是法文中常用的，被他拿來指代「政府耍弄的花招」，陽性的政治事物則是「法、權力和共同體的原則」(Rancière, 1998／姜宇輝譯，2007，頁 3)，治安與他所秉持的平等之間的對抗 (李三達，2014，頁 53-57)。

² 原文標題為〈信心的生產：象徵財貨經濟學〉(La production de la croyance: contribution à une économie des biens symboliques)，這無法不讓人想起馬克思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值論，因為生產者是文化商人，「象徵銀行家」，從事的也非一般生產，而是要神聖化作品；而且，正因象徵資本的積累拋棄了短期利益，才能獲得長期（更大的）收益，也即藝術生產分作：（能夠積累象徵資本的）有限生產（即「為藝術而藝術」或為生產者生產）與（快速獲取經濟資本的）大量生產。在這個理論中，布赫迪厄對於審美就有一種精英視角，認為限量生產的只有少部分人能夠感受。洪席耶有力地批判了他的調查研究¹：

他判斷音樂鑑賞力，但並不讓聽音樂……把音樂鑑賞力的測試轉化為知識考試……最終測試了判斷調查意義的能力以及做出相應反應的能力（Rancière, 1983/2002／蔣海燕譯，頁 290-291）

布赫迪厄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包括他自己的階級出身與成就的張力，最後也只不過是評價自己是「分裂的慣習」（*habitus clivé*）。在他最後一環的象徵革命中²，他仍關注的是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馬內（Édouard Manet）等人，這些出身優渥的布爾喬亞領導了一場對國家這個象徵資本中央銀行的革命。不過同時，他也太過執著於理論史的傳統，評價韋伯「為象徵體系理論到來的決定性貢獻，因為他重新引入了專業化的行動者和他們的特殊利益」（Bourdieu, 1997／劉暉譯，2009，頁 209），進而得出馬內出自半學院派老師，正如韋伯的古猶太教研究中，「先知是從教士中產生的；偉大的異端創始人就是先知，他能在街頭講出通常只在博士圈裡表達的話」（Bourdieu &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法文版書名是 *Contribution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¹ 列下有關的幾部書名：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貧困的哲學》（*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1846）；馬克思，《哲學的貧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1847）；洪席耶，《哲學家和他的窮人們》（*Le Philosophe et ses pauvres*, 1983）；布赫迪厄出版的訪談錄，《世界的苦難》（*La Misère du monde*, 1993）。

² 不過，這些也不全是他晚期的思考，他 25 歲時在阿列省（Allier）當高中教師，就在課上講馬內的象徵革命了（Fabiani, 2017／陳秀萍譯，2019，頁 386）。

Chartier, 2010, p. 91／馬勝利譯，2012，頁 101）。其實，這正是一種可能。在象徵革命的具體分析中，布赫迪厄並沒有忘記支撐藝術市場的布爾喬亞基礎的擴大（Bourdieu, 2013／陳宗文譯，出版中），而讀者也會從中讀出布赫迪厄的聲音——雖然他沒有那些家傳的資本——我就是馬內（Manet, c'est moi; Casanova, 2013/2018；Fabiani, 2017／陳秀萍譯，2019，頁 384-385）。在分析性別時，他也稱讚女性和性少數群體，來成為這個時代的象徵革命。接下來的章節正是要探討這個問題，公眾能否完成這場革命的問題。

Reckwitz（2017, S. 121, 127-128／鞏婕譯，2019，頁 90、94-95）的批判理論接續了布赫迪厄的經典《區判》，將之歸納為「獨異性社會」（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äten），他和馬克思一樣區分了財貨與商品，並繼續將財貨分為：功能財貨「遵循的是目的理性邏輯」，「人們利用財貨的『用處』時不帶感情」；文化財貨「在消費者那裡獲得了自我價值賦值」，它「感動主體」。他同時也不同意布赫迪厄的觀點，認為文化是在使用中得到的，而「社會名望則是發生在第三人那裡的效應」，不能混為一談。他分析的獨異品經濟是以藝術作範式的，關鍵在於其獨特而稀有，獨特是「必備」的，指「自複雜性的厚度及『絕對的』、根本的與眾不同」，稀有則是「可選的」，技術複製後的文化財貨能夠同時讓多人享有，這不影響獨異性。

米埃及把布赫迪厄的象徵財貨融入了文化產業的討論中，提出了融合、合作、創意三種產業模型，不過這種分類意義不大，正像作者寫的「有了谷歌，象徵財貨的產業化開始了」，是為三種模型之統一（Bouquillon, Miège, & Moeglin, 2013／石冰怡譯，2017，頁 74）。

我們在其間看到了明顯的張力。一方面，更多種的勞動從屬¹（Subsumtion, subsumption）於資本，從形式上的到實際上的，即從絕對剩餘價值的剝削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MEGA² II-4.1: 91-108／馬恩全集卷三十八頁 103-123）。一

¹ 日文譯「包摂」，之前有部分中文譯「吸納」，本為黑格爾的哲學術語「歸攝」。馬克思確實在此用黑格爾哲學來考慮對立的勞動與資本兩概念。

方面是藝術本身的特性使然，使用價值的不確定，同時不適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大部分還處於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¹（Parkhurst, 2020; Beech, 2015）。而另一方面，更多的勞動者是願意被這個部門僱傭與剝削的（Huws, 2019, chap. 5）。但我們至少可以從形塑主體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作家「要借助這些決定機制將自己生產成創作者，也就是他自己這個創作的主體」（Bourdieu, 1992/1998／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 176）。當然，這仍離不開經濟的支撐，需要和經驗材料一起談。

三、重思上層建築

從這裡看，基礎與上層建築、唯心論與唯物論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伊果頓追溯文化到「『農事』，或對自然生長的照料」這一原義，試圖說明文化「起初意味著一個徹底的物質過程，後來才轉喻為關乎精神的事情」（Eagleton, 2000, p. 1／林志忠譯，2002，頁 1-2）。而霍耐特在重寫黑格爾法哲學時提出，「黑格爾精神辯證法思想基礎的唯心主義一元論的先決條件，已經變得不可想象」（Honneth, 2011／王旭譯，2013，頁 12）。霍耐特明顯更貼近馬克思最初的批判。

在馬克思提出人類存在是歷史的前提之後，他第一個提到的自然條件就是地質，馬克思對地質學頗有一番研究，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他更為合適。望月 清司（1973／韓立新，2009，頁 459-460）重新以地質學的術語翻譯了馬克思致查蘇里奇的信，並重新以此轉譯 1859 年序言。

地球的原始成層或第一次成層是由一系列不同年代疊起來的單層組成。同樣，社會的原始構成也是這樣，它表現為一系列不同的、標誌著累積時代的階段。

我們可以將從經濟觀點來看的社會視為所謂的成層〔成層群〕，如果描繪一下它的大致輪廓，就是在這些成層〔成層群〕中，亞細亞、古代世

¹ 布赫迪厄的觀點在這裡又是非精英的，竟然類似班雅明，集體的腦力勞動可以消除傳統上屬於個人的靈韻（Bourdieu, 1971/1985, p. 33），雖然他自己就是明顯的反例。

界、封建社會、近代市民社會等不同時代的各種生產方式構成了按時間順序累積形成的各個地層的世，這些世重疊著。

望月 清司據此發展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但同樣的思路我也可以用於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而這可以比阿爾都塞的建築學隱喻更進一步。基礎和上層建築本身自然有所分野又十分類似，但上層建築作為目前的地層中最上層的那一個，但革命發生時，也會成為基礎的一部分而作用，並在未來成為新上層建築的基礎，即被新的地層掩蓋。這個新的地層是經由革命而得的，像是火山噴發一樣，原來基礎地層中的內容噴涌落在新地層上，即原有的社會組織方式、生產方式等等將在更高的層面上回歸。而在上層建築中的人的思想，可以理解作最新地層上的人，受限於重力又不斷試圖掙脫。

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此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於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MEGA² I-5: 40／馬恩文集卷一頁 540）

對其中一部分自稱唯物論之人，如果忘記了時代，那麼回去馬恩寫下唯物史觀之前吧，這一兩句批判仍然有用：

儘管滿口講的都是所謂「震撼世界的」詞句，卻是最大的保守派……現實的世界仍舊無所改變他們只是用詞句來反對這些詞句；既然他們僅僅反對這個世界的詞句，那麼他們就絕對不是反對現實的現存世界。（MEGA² I-5: 7／馬恩文集卷一頁 516；孫善豪，2016b，頁 5）

理論部分的探討暫告一段落，餘下部分要在經驗研究結束後一併討論了。布赫迪厄的理論真的是人類學式適用的嗎，其中的競技如此契合資本主義社會，我們難道沒有機會超越嗎？如何完成一場顛覆布赫迪厄的象徵革命？可感的分配會與國家相關嗎，要如何突破？在這個 AI 威脅腦力勞動之際，在非同質化代幣（Non-

fungible tokens, NFT) 結合區塊鏈技術將要再次為所有創作定價的「班雅明時刻」，我們應該如何回應？我將在下一章討論基礎，再下一章討論上層建築。

參考文獻¹

〈中國政治暗語「入關學」與「加速主義」：年輕一代的幻滅和狂熱〉（2020年8月18日），BBC中文網，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3803071>

王才勇譯（2006）。〈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第一稿〉，王才勇（譯）《攝影小史·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頁45-104。南京：江蘇人民。（原文

Benjamin, W. [1980].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In R. Tiedemann, u. H. Schweppenhäuser (Hrsg.),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1.2; S. 431-469). Frankfurt/Main, DE: Suhrkamp.)

王旭譯(2013)。《自由的權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原書 Honneth, A. [2011].

Das Recht der Freiheit. Grundriß einer demokratischen Sittlichkeit. Frankfurt/Main, DE: Suhrkamp.)

王洪喆、李思閩、吳靖（2016）。〈從「迷妹」到「小粉紅」：新媒介商業文化環境下的國族身分生產和動員機制研究〉，《國際新聞界》，36: 33-53。

王炳鈞譯（2014）。〈作為生產者的作者——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義研究院的講話〉，王炳鈞、陳永國、郭軍、蔣洪生（譯），《作為生產者的作者》，頁1-34。鄭州：河南大學。（原文 Benjamin, W. [1988]. *Der Autor als Produzent*. In *An gelus Novu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2* (S. 101-119). Frankfurt/Main, DE: Suhrkamp.)

王涌譯（2017）。〈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1935-1939）（第三稿）〉，王涌（譯），《藝術社會學三論》，頁41-95。南京：南京大學。（原文

¹ 政治大學中正圖書館一樓新設「陳芳明書坊」，陳教授在牆上留下了獻辭，並署了地點「Belmont, CA」，本人疑慮，上網搜索後方知，此處的「CA」指的不是加拿大，而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 US）。爲了避免這種混淆和錯誤，美國出版的文獻不直接遵循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格式（畢竟美國不是我祖國），而是在美國州名後加「US」的國名，以示區分。另有些轉譯的外文書，本應如引用中文書一樣標明原書，不過這樣略顯繁瑣，且不一定有人用得到，所以，只在譯本不全，有所刪減的情況下，才註明原書。

- Benjamin, W. [1963].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Drei Studien zur Kunstsoziologie* (S. 7-44). Frankfurt/Main, DE: Suhrkamp.)
- 王乾任譯（2002）。《立法者與詮釋者》。台北：弘智文化。（原書 Bauman, Z. [1987].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Cambridge, UK: Polity.）
- 王斑譯（2008）。〈瓦爾特·本雅明：1892-1940〉，張旭東、王斑（譯），《啓迪：本雅明文選》，頁 21-68。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文 Arendt, H. [1969].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In H. Arendt (Ed.)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H. Zohn, Trans., pp. 1-55). New York, NY, US: Schocken.）
- 王喆（2016）。〈今晚我們都是帝吧人：作為情感化遊戲的網路民族主義〉，《國際新聞界》，36: 75-90。
- 王曉昇譯（2011）。〈象徵形式的分裂世界——關於皮埃爾·布迪厄的文化社會學論著〉，王曉升（譯），《分裂的社會世界：社會哲學文集》，頁 164-18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原文 Honneth, A. [1984/1990]. Die zerrissene Welt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Zum kultursoziologischen Werk Pierre Bourdieus. *Die zerrissene Welt des Sozialen. Sozialphilosophische Aufsätze* (S. 177-202). Frankfurt/M, DE: Suhrkamp.）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多卷本）。北京：人民。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0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北京：人民。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0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版）》（四卷本）。北京：人民。
- 中共研究雜誌社（1980-1985）。《大陸地下刊物彙編》。台北：國防部情報局（第一到四輯）；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第五到二十輯）。

中國政府採購網（2019 年 8 月 16 日）。〈中國新聞社中新社、中新網 Twitter 帳號推廣政府採購項目中標公告〉，取自：

http://www.ccgp.gov.cn/cggg/dfgg/zbgg/201908/t20190816_12699714.htm

方杰譯（2002）。〈信念與普通生活：一次訪談錄〉，方杰（譯），《圖繪意識形態》，頁 349-365。南京：南京大學。（原文 Bourdieu, P., & Eagleton, T. [1992/1994]. *Doxa and common life: An interview*. In S. Žižek (Ed.) *Mapping Ideology* (pp. 265-277). London, UK: Verso.）

石冰怡譯（2017）。《符號性商品的產業化：基於文化產業的創意產業》。北京：商務。（原書 Bouquillon, P., Miège, B., & Moeglin, P. [2013].

L'industrialisation des biens symboliques. Les industries créatives en regard des industries culturelles. Grenoble, FR: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石武耕、李沅沅、陳羚芝譯（2016）。《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台北：典藏藝術家庭。（原書 Bourdieu, P. [1992/1998]. *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 Paris, FR: Le Seuil.）

艾彥譯（2001）。《意識型態和烏托邦》。北京：華夏。（原書 Mannheim, K. [1929]. *Ideologie und utopie*. Bonn, DE: Friedrich Cohen.）

田時綱（2007）。〈「egemonia」是「領導權」還是「霸權」？——葛蘭西政治理論的核心範疇〉，《教學與研究》，2007(8): 84-87。

刑克超譯（2002a）。《繼承人：大學生與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Bourdieu, P., & Passeron, J.-C. [1964/1985]. *Les héritiers. Les étudiants et la culture*. Paris, FR: Minuit.）

刑克超譯（2002b）。《再生產：一種教育系統理論的要点》。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Bourdieu, P., & Passeron, J.-C. [1970]. *La reproduction. É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 Paris, FR: Minuit.）

朱軒（2020 年 3 月 18 日）。〈微信回應「華商太難了雷同文章刷屏」：封禁 50 個違規公眾號〉，澎湃新聞，取自：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571085

朱國華（2016）。《權力的文化邏輯：布迪厄的社會學詩學》。上海：上海人民。

- 吳子楓譯（2017）。〈論偶然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49: 116-124。
（原文 Althusser, L. [2005]. Du matérialisme aléatoire (1986). *Multitudes*, n°21, 179-194.）
- 吳子楓（2019a）。〈譯後記〉，吳子楓（譯）《論再生產》，頁。西安：西北大學。（原書 Althusser, L. [1995/2011]. *Sur la reproduction* (J. Bidet, dir.). Paris, FR: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吳子楓譯（2019b）。《論再生產》。西安：西北大學。（原書 Althusser, L. [1995/2011]. *Sur la reproduction* (J. Bidet, dir.). Paris, FR: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李三達（2014）。《朗西埃平等主義美學研究》。南京大學文藝學博士論文。
- 李屹譯（2020）。《牆國誌：中國如何控制網路》。台北：遊擊文化。（原書 Griffiths, J. [2019].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How to build and control an alternative version of the internet*. London, UK: Zed Books.）
- 李沅洳譯（2019）。《學術人》。台北：時報。（原書 Bourdieu, P. [1984/1992]. *Homo academicus*. Paris, FR: MInuit.）
- 李祖喬譯（2017）。《複製的藝術：文革期間的文化生產及實踐》。香港：中文大學。（原書 Pang, L. [2017]. *The art of cloning: Creative production dur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UK: Verso.）
- 李乾坤（2016）。〈理性自我否定的現實根源：析《啓蒙辯證法》的政治經濟學方法〉，《求是學刊》，43(3): 14-21。
- 汪行福（2011）。〈社會鍊金術——布迪厄對意識型態的概念化和批判〉，《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9: 105-126。
- 邱林川、陳韜文編（2011）。《新媒體事件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汲喆譯（2019）。《禮物：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北京：商務印書館。
（原書 Mauss, M. [1923-1924]. *Essai sur le don. Forme et raison de l'échange dans les sociétés archaïques*, *Année Sociologique*, seconde série, 1, 30-186.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93922b/f36.table>）

- 何道寬譯（2014）。《新新媒介（第二版）》。上海：復旦大學。（原書 Levinson, P. [2012]. *New new media* (2nd ed.). London, UK: Pearson.）
- 貝嶺（1998年6月21日）。〈當代中國大陸的地下刊物與地下出版物〉，《世界週刊》，744: 24-27。
- 金大陸（2011）。《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下卷）》。上海：上海辭書。
- 周達、苗偉山（2016）。〈競爭性的圖像行動主義：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一種視覺傳播視角〉，《國際新聞界》，36: 129-143。
- 林志忠譯（2002）。《文化的理念》。台北：巨流。（原書 Eagleton, T. [2000]. *The idea of culture*. Oxford, UK: Blackwell.）
- 林宏濤譯（2008）。《啓蒙的辯證：哲學的片簡》。台北：商周。（原書 Horkheimer, M. & Adorno, T. W. [1969].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Frankfurt/Main, DE: S. Fischer.）
- 孟登迎、趙文、劉凱譯（2010）。《法蘭克福學派：歷史、理論及政治影響》。上海：上海人民。（原書 Wiggershaus, R. [1986/1995].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Cambridge, MA, US: MIT Press.）
- 韋乞（2020年7月27日）。〈加速主義：作為一種嚴肅的政治（抗爭）立場〉，端傳媒，取自：<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727-opinion-what-is-accelerationism/>
- 俞可平等編譯（2018）。《馬克思主義歷史考證大辭典：第一卷・從國家的消亡至先鋒隊》。北京：商務。（原書 Haug, W. F. [1994/1996]. *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 Bd. I. Abbau des Staates bis Avantgarde*. Hamburg, DE: Argument.）
- 姜宇輝譯（2007）。《政治的邊緣》。上海：上海譯文。（原書 Rancière, J. [1990/1998]. *Aux bords du politique*. Paris, FR: La Fabrique.）

- 郝志東譯¹（2020）。《十字路口的知識份子：中國知識工作者的政治變遷》。新北：致知學術。（原書 Hao, Z. [2003]. *Intellectuals at a crossroads: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China's knowledge workers*. Albany, NY, U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胡繼華譯（2005）。《為承認而鬥爭》。上海：上海人民。（原書 Honneth, A. [1992]. *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 Frankfurt/M, DE: Suhrkamp.）
- 陳力丹（2016）。《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陳力丹、黃煜、廖雪婷（2019）。〈對話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傳播與社會學刊》，50: 1-26。
- 陳至潔（2018年6月20日）。〈鳥籠中的微信，與「插翅難飛」的中國境外網民〉，端傳媒。取自：<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620-opinion-chentitus-overseas-wechat/>
- 陳秀萍譯（2019）。《布赫迪厄：從場域、慣習到文化資本，「結構主義英雄」親傳弟子對大師經典概念的再考證》。台北：麥田。（原書 Fabiani, J.-L. [2016]. *Pierre Bourdieu. Un structuralisme héroïque*. Paris, FR: Le Seuil.）
- 陳宜中（2013）。《中國關鍵七問：憂思者的訪談》。台北：聯經。
- 陳宜中（2016）。《中國轉型六問：富國強兵之外》。台北：聯經。
- 陳宜中（2021）。《大國的想望：天下主義、強國主義及其他》。台北：聯經。
- 陳宗文譯（出版中）。《馬內：一場象徵革命》。（原書 Bourdieu, P. [2013]. *Manet une révolution symbol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98-2000) suivis d'un manuscrit inachevé de Pierre et Marie-Claire Bourdieu*. Paris, FR: Le Seuil.）

¹ 雖然版權頁標明的是義大利文版，但實際譯自英文。義文原書 *Movimenti nell'Impero*, Milano, IT: Raffaello Cortina.

- 陳重亨譯（2015）。《鍵盤參與時代來了！：微軟首席研究員大調查，年輕人如何用網路建構新世界》。台北：時報。（原書 boyd, d. [2014]. *It's complicated: 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 New Haven, CT,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陳逸淳譯（2012）。《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會學文集》。台北：麥田。（原書 Bourdieu, P. [1987]. *Choses dites*. Paris, FR: Minuit.）
- 陳逸淳、黃敏原（2019）。〈論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象徵暴力」概念〉，《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69: 51-106。
- 陳榮泰、伍啟鴻譯（2017）。《激情的經濟學：我們從未理性過？塔德人類學的經濟解讀》。台北：群學。（原書 Latour, B. & Lépinay, V. A. [2008]. *L'économie, science des intérêts passionnés. Introduction à l'anthropologie économique de Gabriel Tarde*. Paris, FR: La Découverte.）
- 陳樂民（2013）。〈中譯本序言：人需要學會「懺悔」〉，蔡鴻濱（譯）《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頁 1-4。上海：上海人民。（原書 Althusser, L. [1992]. *L'avenir dure longtemps, suivi de Les faits* (O. Corpet & Y. M. Boutang, dir.). Paris, FR: Stock/IMEC.）
- 郭大力譯（1984）。《政治經濟學理論》。北京：商務。（原書 Javons, W. S. [1871/1879].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UK: Macmillan & Co.）
- 郭小安、楊紹婷（2016）。〈網路民族主義運動中的米姆式傳播與共意動員〉，《國際新聞界》，36: 54-74。
- 郭莉（2016）。〈譯者前言〉，郭莉、黃新譯，《鄧拓：毛時代的中國文人》（pp. vii-xi）。香港：牛津大學。（原書 Cheek, T. [1998].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 Oxford, UK: Clarendon.）
- 郭莉、黃新譯（2016）。《鄧拓：毛時代的中國文人》。香港：牛津大學。（原書 Cheek, T. [1998].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 Oxford, UK: Clarendon.）
- 夏凡譯（2020a）。〈論音樂的拜物性和聽覺退化〉，夏凡（編），《阿多爾諾基礎讀本》，頁 215-241。杭州：浙江大學。（原文 Adorno, T. W. [1938/1973]. *Über den Fetischcharakter der Musik und die Regression des Hörens*. In R.

- Tiedemann (Hrsg.),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14, Dissonanzen. Einleitung in die Musiksoziologie* (S. 14-50). Frankfurt/Main, DE: Suhrkamp.)
- 夏凡譯 (2020b)。〈文化工業概要〉，夏凡 (編)，《阿多爾諾基礎讀本》，頁 286-294。杭州：浙江大學。(原文 Adorno, T. W. [1967/1977]. *Résumé über Kulturindustrie*. In R. Tiedemann (Hrsg.),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10-I,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I* (S. 337-345). Frankfurt/Main, DE: Suhrkamp.)
- 夏凡譯 (2020c)。〈大眾文化的圖式〉，夏凡 (編)，《阿多爾諾基礎讀本》，頁 297-327。杭州：浙江大學。(原文 Adorno, T. W. [1981]. *Das Schema der Massenkultur*. In R. Tiedemann (Hrsg.),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3,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S. 299-335). Frankfurt/Main, DE: Suhrkamp.)
- 展江、彭桂兵 (2011)。〈「霸權」、「領導權」抑或其他？——葛蘭西 hegemony 概念與漢譯探討〉，《國際新聞界》，205: 6-12。
- 翁尚均譯 (2020)。《話語權的世紀角力：從 TED、論壇到智庫，公共知識分子及意見領袖面對「思想產業」的理念拉鋸與道德考驗》。台北：麥田。(原書 Drezner, D. W. [2017]. *The ideas industry: How pessimists, partisans, and plutocrats are transforming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New York, NY, 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連俊翔 (2020)。《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策略與宣傳效果：基於共青團中央知乎內容的分析》。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高振華、李思宇譯 (2017)。《實踐理論大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原書 Bourdieu, P. [1972]. *Esquisse d'une theorie de la pratique. Précédé de «Trois études d'ethnologie kabyle»*. Genève, CH: Droz.)
- 孫旭培 (2013)。《坎坷之路：新聞自由在中國》。高雄：巨流。
- 孫善豪 (1998/2009)。〈馬克思論意識形態〉，《批判與辯證：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論文集》。台北：唐山。
- 孫善豪 (2016a)。〈導論〉，孫善豪 (譯)《德意志意識形態：I. 費爾巴哈 原始手稿》，頁 i-xlvi。台北：聯經。(原書 Marx, K., & Engels, F. [1845-1846].

- Deutsche Ideologie: I. Feuerbach*. Unveröffentlichtes Manuskript, 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Amsterdam, NL.)
- 孫善豪譯 (2016b)。《德意志意識型態：I. 費爾巴哈 原始手稿》。台北：聯經。
- (原書 Marx, K., & Engels, F. [1845-1846]. *Deutsche Ideologie: I. Feuerbach*. Unveröffentlichtes Manuskript, 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Amsterdam, NL.)
- 孫麒翔、石飛月 (2017 年 2 月 6 日)。〈只剩下門縫的 VPN 何去何從〉，《北京商報·產經週刊》，取自：
<https://www.bbtnews.com.cn/2017/0206/180250.shtml>
- 海陽 (2020 年 5 月 26 日)。〈起底至道學宮：主筆白雲先生疑為背後公司實控人姚玉祥〉，《新京報》。取自：
<http://www.bjnews.com.cn/inside/2020/05/26/731786.html>
- 華達 (Claude Widor) 編 (1981)。《中國民辦刊物彙編》(二卷本)。香港：《觀察家》。
- 馬勝利譯 (2012)。《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布爾迪厄與夏蒂埃對話錄》。北京：北京大學。(原書 Bourdieu, P., & Chartier, R. [2010]. *Le sociologue et l'historien*. Marseille, FR: Agone.)
- 袁廣泉譯 (2020)。《「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原書 石川 禎浩 [2016]. *《赤い星は如何にして昇ったか：知られざる毛沢東の初期イメージ》*。京都：臨川書店。)
- 聶錦芳 (2018a)。《在批判中建構「新哲學」框架：〈德意志意識形態〉文本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聶錦芳 (2018b)。《濫觴與勃興：馬克思思想起源探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張弘譯 (1996)。《中世紀的知識份子》。北京：商務。(原書 Le Goff, J. [1987]. *Die Intellektuellen im Mittelalter*. Stuttgart, DE: Klett-Cotta. ([1957/1985]. *Les intellectuels au moyen âge*. Paris, FR: Le Seuil.))
- 張建華 (2008)。《俄國知識份子思想史導論》。北京：商務。
- 張秀琴 (2018)。《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理解史》。北京：人民。

- 張維倫 等譯（2003）。《文化經濟學》。台北：典藏藝術家庭。（原書 Throsby, D. [2000].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區立遠譯（2020）。《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台北：時報。（原書 Fukuyama, F. [1992/2006].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NY, US: Free Press.）
- 渡辺 雅男（2019）。〈僅從生產視角看待消費過程的侷限性——日本「服務勞動的生產性論戰」的最新進展〉（高晨曦 譯），《海派經濟學》，17(1): 178-191。
- 渡辺 雅男、高晨曦（2018）。〈「服務」業的政治經濟學〉，《當代經濟研究》，2018(7): 13-21。
- 渡辺 雅男、高晨曦（2019）。〈資本對消費過程的統制：消費資本論〉，《政治經濟學季刊》，2(2): 31-51。
- 渡辺 雅男、賈利軍、高晨曦（2019）。〈非生產資本範疇探源——非生產費用的資本化與資本職能的二重化〉，《當代經濟研究》，2019(7): 5-14。
- 馮建三譯（1992）。《廣告的符碼：消費社會的商品崇拜和意義的政治經濟學》。台北：遠流。（原書 Jhally, S. [1987].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Fetish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aning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UK: Routledge.）
- 許陳品（2014）。《革命群眾報刊視野下的地方文革：以重慶、武漢為例（1966-1968）》。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康樂、簡惠美譯（2007）。《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台北：遠流。（原書 Weber, M. [1904-1905/1920].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Bd. I. Tübingen, DE: Mohr.）
- 盛福剛（2021）。〈Online 版《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章的編輯及其國際意義——兼評漢譯本改稿異文的編譯〉，《山東社會科學》，2021(2): 42-51。
- 董立文（1997）。《論九十年代中共的民族主義》。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淑玲（2003）。〈男子性與喝花酒文化：以 Bourdieu 的性別支配理論為分析架構〉，《台灣社會學》，5: 73-132。
- 黃琰譯（2013）。《審美資本主義：品味的工業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原書 Assouly, O. [2008]. *Le capitalisme esthétique. Essai sur l'industrialisation du goût*. Paris, FR: Cerf.）
- 黃幀昕（2019）。《線上粉絲社群如何「製造」新媒體事件》。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論文。
- 曾金燕（2016）。《中國女權：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 斯影（2019年5月21日）。〈六四30週年：「寒冬」前中國記者最自由的三天〉，BBC 中文網，取自：<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8312262>
- 董璐譯（2013）。《商品美學批判：關注高科技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原書 Haug, W. F. [1971/2009]. *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Gefolgt von Warenästhetik im High-Tech-Kapitalismus*. Frankfurt/Main, DE: Suhrkamp.）
- 彭曦譯（2005）。《文獻學語境中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南京：南京大學。（原書 廣松 涉 編 [1974]. 《新編集版ドイツ・イデオロギー》。日本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 萬毓澤（2018）。《你不知道的馬克思：精選原典，理解資本主義，尋找改造社會的動力》。台北：木馬文化。
- 楊尚儒（2012）。〈獨裁或專政？由漢譯名探討施米特的 Diktatur 概念〉，《政治科學論叢》，54: 1-36。
- 楊亞平譯（2018）。《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北京：商務。（原書 Bourdieu, P. [1989]. *La Noblesse d'État. Grandes écoles et esprit de corps*. Paris, FR: Minuit.）
- 楊錄民（2019）。《國家面前無愛豆？：台港藝人認同爭議事件中的中國網路國族主義》。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論文。

- 褚思真、劉暉譯（2005）。《言語意味著什麼：語言交換的經濟》。北京：商務。
- （原書 Bourdieu, P. [1982].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L'économie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 Paris, FR: Fayard.）
- 溫雲超（2009）。〈「我們的意志是樂觀的」：中國另類傳播的生機就在夾殺中〉，《新聞學研究》，99: 241-264。
- 趙文丹譯（2018）。《互聯文化：社交媒體批判史》。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原書 van Dijck, J. [2013].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廖育正（2019）。〈「幻化遊戲」與「懸置遊玩」：論洪席耶對布爾迪厄的批判〉，《中外文學》，48(1): 127-162。
- 蔡宜真、林秀玲譯（2003）。《當藝術遇上經濟：個案分析與文化政策》。台北：典藏藝術家庭。（原書 Frey, B. S. [2000]. *Arts & economics: Analysis & cultural policy*. Berlin, DE: Springer.）
- 蔡霞（2020 年 12 月 4 日）。〈失敗的黨：一個體制內人士與北京決裂〉，*Foreign Affairs*，取自：<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12-04/shibaiedang>
- 蔡鴻濱譯（2013）。《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上海：上海人民。（原書 Althusser, L. [1992]. *L'avenir dure longtemps, suivi de Les faits* (O. Corpet, & Y. M. Boutang, dir.). Paris, FR: Stock/IMEC.）
- 劉忠博、陳娟、邵成圓（2019）。〈中國愛國網紅的民族主義之形成與內涵：以周小平文章的內容分析為例〉，《傳播、文化與政治》，9: 31-61。
- 劉紀蕙、林淑芬、陳克倫、薛熙平譯（2011）。《歧義：政治與哲學》。台北：麥田。（原書 Rancière, J. (1995). *La méésentent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 Paris, FR: Galilée.）
- 劉海龍（2015）。〈從「文化工業」到文化產業」：從關鍵詞的變遷看中國媒介文化研究〉，《重訪灰色地帶：傳播研究史的書寫與記憶》，頁 140-163。北京：北京大學。

- 劉海龍（2017）。〈像愛護愛豆一樣愛國：新媒體與「粉絲民族主義」的誕生〉，《現代傳播》，2017(4): 27-36。
- 劉暉譯（2009）。《帕斯卡爾式的沉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原書 Bourdieu, P. [1997]. *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 Paris, FR: Le Seuil.）
- 劉暉譯（2017）。《男性統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原書 Bourdieu, P. [1998].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Paris, FR: Le Seuil.）
- 劉曉波（1990）。《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分子》。台北：唐山。
- 劉曉波（1992/2017）。《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台北：時報。
- 劉毅（2007）。〈「合法性」與「正當性」譯詞辨〉，《博覽群書》，2007(03): 55-60。
- 閻睿悅（2016 年 5 月 1 日）。〈微信空間裏，神一般存在的「10 萬+」是什麼？〉，端傳媒。取自：<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501-mainland-wechat/>
- 魯克儉（2016）。《走向文本研究的深處：基於 MEGA2 的馬克思文獻學清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 魯克儉（2018）。《建構中國馬克思學》。北京：中央編譯。
- 蔣海燕譯（2014）。《哲學家和他的窮人們》。南京：南京大學。（原書 Rancière, J. [1983/2002]. *Le philosophe et ses pauvres*. Paris, FR: Fayard.）
- 蔣梓驊譯（2003）。《實踐感》。南京：譯林。（原書 Bourdieu, P. [1980]. *Le sens pratique*. Paris, FR: Minuit.）
- 鞏婕譯（2019）。《獨異性社會：現代的結構轉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原書 Reckwitz, A. [2017]. *Die 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äten. Zum Strukturwandel der Moderne*. Frankfurt/Main, DE: Suhrkamp.）
- 盧南峰、吳靖（2018）。〈歷史轉折中的宏大敘事：「工業黨」網絡思潮的政治分析〉，《東方學刊》，1: 49-60。
- 鮑羿岑（2018）。《新媒介與民族主義：2016 年「帝吧遠征」事件的再思考》，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 錢永祥譯（1985／1991）。〈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錢永祥（編），《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頁 169-239）。台北：遠流。（原文 Weber, M. [1919/1980]. *Politik als Beruf*. In J. Winckelmann, (Hrsg.). *Ge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4. Aufl.; S. 505-560). Tübingen, DE: Mohr.）
- 錢理群（2008）。《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台北：行人。
- 錢理群（2017）。《1949-1976：歲月滄桑》。香港：城市大學。
- 韓立新譯（2009）。《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原書望月 清司 [1973]. 《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
- 謝晶（2019）。《從涂爾干到莫斯：法國社會學派的總體主義哲學》。上海：上海人民。
- 譚立德譯（2007）。《實踐理性：關於行為理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 Bourdieu, P. [1996]. *Raisons pratiques. Sur la théorie de l'action*. Paris, FR: Le Seuil.）
- 譚銳捷（2017 年 12 月 29 日¹），〈什麼是加速主義〉，城與邦，取自：
<https://chengyubang.blogspot.com/2018/01/no-110.html>
- 羅世宏、徐福德譯（2017）。《社群媒體批判理論》。台北：五南。（原書 Fuchs, C. [2013]. *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UK: SAGE.）
- 羅清、趙仲強譯（1989）。《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原書 Service, J. S. [1974].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J. W. Esherick, Ed.). New York, NY, US: Random House.）
- 羅廣彥（2019）。《社群媒體時代的中國網路民族主義：以「共青團中央」新浪微博為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¹ 該文原發在微信公眾號中，現無法尋得，據 wemp 網站抓取時間改，見：

<https://wemp.app/posts/a800c82d-019c-45b1-a5af-c28fb7a918f3>

- 嚴玲娟譯（2008）。《為什麼藝術家那麼窮？：打破經濟規則的藝術產業》。台北：典藏藝術家庭。（原書 Abbing, H. [2002]. *Why are artists poor?: The exceptional economy of art*. Amsterdam, NL: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蘇超、甘晨譯（2016）。〈防火牆真的讓中國與世隔絕了嗎？從整合互聯網屏蔽和文化因素的角度來解釋網絡用戶的使用習慣〉，《傳播與社會學刊》，35: 27-55。（原文 Taneja, H., & Wu, A. X. [2014]. Does the great firewall really isolate the chinese?: Integrating access blockage with cultural factors to explain web user behavi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30(5), 297-309.）
- 顧良譯（2010）。《保衛馬克思》。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Althusser, L. [1965/1996]. *Pour Marx*. Paris, FR: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 Althusser, L. (1973/1976).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G. Lock, Ed.). London, UK: New Left Books.
- Althusser, L. (1995). Réponse à une critique. In *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 tome II* (F. Matheron, Ed.; pp. 351-391). Paris, FR: Stock/IMEC.
- Althusser, L. (2006).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87* (F. Matheron & O. Corpet, Eds.; G. M. Goshgarian, Trans.). London, UK: Verso.
- Althusser, L. (1966/2014).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 E. Smith Trans.). *Décalages*, 1(1), Retrieved From: <https://scholar.oxy.edu/decalages/vol1/iss1/9>
- Althusser, L. (1995/2014).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G. M. Goshgarian, Trans.). London, UK: Verso.
- Anderson, P. (2017). *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 London, UK: Verso.
- Baumol, W. J., & Bowen, W. G. (1966). *Performing arts - the economic dilemma: A study of problems common to theater, opera, music and dance*. New York, NY, US: Twentieth Century Fund.
- Benjamin, W. (1936). L'Œuvre d'art à l'époque de sa reproduction mécanisé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5(1), 40-68.
- Bolsover, G. (2019). China: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a widespread practice. In S. C. Woolley & P. N. Howard (Eds.)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Political parties, politicians,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on social media* (pp. 212-238).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72/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R. Nice, Tra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77/1979). Symbolic power (R. Nice, Trans.).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4(13-14), 77-85.
- Bourdieu, P. (1977/1980). The production of belief: Contribution to an economy of symbolic good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3), 261-293.
- Bourdieu, P. (1971/1985). The market of symbolic goods. *Poetics*, 14(1-2), 13-44.
- Bourdieu, P. (1983/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58). New York, NY, US: Greenwood.
- Bourdieu, P., & Grenfell, M. (2019). *Encounter 1: Pierre Bourdieu in conversation with Michael Grenfell* (M. Grenfell, Trans.). Canberra, Australia: Centre for Creative and Cultur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nberra, with Recent Work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www.michaelgrenfell.co.uk/bourdieu/pragmatics-2019-interview-with-p-bourdieu/>
- Bourdieu, P., & Wacquant, L. (2013). Symbolic capital and social classes.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3(2), 292-302.
- Branchu, C., & Robbins, D. (2019). A commentary on Althusser's 1963 presentation of Bourdieu and Passer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6(7-8), 23-44.
- Burawoy, M. (2019). *Symbolic violence: Conversations with Bourdieu*. London, UK: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arré, L. (2019). An "Enchanted" or a "Fragmented" Social World? Recognition and Domination in Honneth and Bourdieu. *Critical Horizons*, 1-21, doi: 10.1080/14409917.2019.1616481
- Chartier, R. (2004). Languages, books, and reading from the printed word to the digital text (T. L. Fagan, Trans.), *Critical Inquiry*, 31(1), 133-152.
- Cheek, T., Ownby, D., & Fogel, J. A. (2019). Introduction: Thinking China in the age of Xi Jinping. In J. A. Fogel, T. Cheek, & D. Ownby (Eds.), *Voices from the chinese century: Public Intellectual debate from contemporary China* (pp.). New York, NY, U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From:

- <https://www.readingthechinadream.com/thinking-china-in-the-age-of-trump-and-xi.html>
- Chen, Y., Mao, Z., & Qiu, J. (2018). *Super-sticky WeChat and chinese society*. Bingley, West Yorkshire, UK: Emerald.
- Doctorow, C. (2012, Mar 2). Censorship is inseparable from surveillance.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2/mar/02/censorship-inseparable-from-surveillance>
- Eagleton, T. (2007).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New and Updated Edition). London, UK: Verso.
- Fowler, B. (2011). Pierre Bourdieu: Unorthodox Marxist?, In S. Susen, & B. S. Turner (Eds.), *The legacy of Pierre Bourdieu: Critical essays* (pp. 33-57). London, UK: Anthem.
- Fincher, L. H. (2018). *Betraying big brother: The feminist awakening in China*. London, UK: Verso.
- Fu, K. W., & Yun, T. (2018, July). Tracking censorship of WeChat Public Accounts in China: A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s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Evanston, IL, US.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Q. Hoare & G. Nowell-Smith, Eds. & Trans.). London, UK: Lawrence & Wishart.
- Guriev, S., & Treisman, D. (2019). Informational autocra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4), 100-127.
- Guriev, S., & Treisman, D. (2020). A theory of informational autocrac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86, 104158. doi: 10.1016/j.jpubeco.2020.104158
- Heinrich, M. (2018/2019). *Karl Marx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ety: The life of Marx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work, vol I, 1818–1841* (A. Locascio, Trans.). New York, NY, US: Monthly Review.
- Honneth, A., Kocyba, H., & Schwibs, B. (1986). The struggle for symbolic order: An interview with Pierre Bourdieu (J. Bleicher, Tran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3), 35-51.
- Huang, H. (2015). Propaganda as signaling. *Comparative Politics*, 47(4), 419-444.

- Huang, H. (2018). The pathology of hard propagand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0(3), 1034-1038.
- Huws, U. (2019). *Labour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What next?*.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Jackson, L. C., & Rivetti, U. (2020). Pierre Bourdieu and Raymond Williams: Correspondence, meeting and crossed references. *Tempo Social*, 32(1), 205-225.
- Jaeschke (2000). Genealogi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Konstitutionsgeschichtliche Bemerkungen in methodologischer Absicht. In A. Arndt, & W. Jaeschke (Hrsg.), *Materialismus und Spiritualismus.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en nach 1848* (S. 219-234). Hamburg, DE: Felix Meiner.
- Karsenti, B. (2011). From Marx to Bourdieu: The limits of the structuralism of practice (S. Susen Trans.), In S. Susen & B. S. Turner, (Eds.), *The legacy of Pierre Bourdieu: Critical essays* (pp. 59-90). London, UK: Anthem.
- Kennedy, E. (1979). "Ideology" from Destutt de Tracy to Marx,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0(3), 353-368.
- Kim, J. Y., Natter, M., & Spann, M. (2009). Pay what you want: A new participative pricing mechanism. *Journal of Marketing*, 73(1), 44-58.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E.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 326-343.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E. (2014). Reverse-engineering censorship in China: Randomized experimentation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cience*, 345(6199), 1251722.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E. (2017).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3), 484-501.
- Lei, Y.-W. (2018). *The contentious public sphere: Law, media,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Woodstock, U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n, Y. (2021). Beaconism and the Trumpian metamorphosis of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0(1), 85-101.

- Link, P. (2002, April 11). China: 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02/04/11/china-the-anaconda-in-the-chandelier/>
- Lu, Y., & Pan, J. (2021). Capturing Clicks: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es Clickbait to Compete for Visibilit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8(1-2), 23-54.
- Marx, K., & Engels, F. (1953-1990). *Marx-Engels-Werke*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K der KPdSU Hrsg., 44 Bde.). Berlin, DE: Dietz.
- Marx, K., & Engels, F. (1975-).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114 Bde.), Berlin, DE: Dietz/Akademie/De Gruyter.
- Miège, B. (1989). *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Bagnolet, FR: International General.
- Miège, B. (2011). Theoriz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Persistent specificities and reconsiderations. In J. Wasko, G. Murdock, & H. Sousa, (Eds.),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C. Salles, Trans., pp. 83-108). Chichester,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 Monaco, N. J. (2019). Taiwan: Digital democracy meets automated autocracy, In S. C. Woolley & P. N. Howard (Eds.)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Political parties, politicians,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on social media* (pp. 104-127).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seum Karl-Marx-Haus Trier (2013). *Karl Marx (1818-1883). Leben-Werk-Wirkung bis zur Gegenwart. Ausstellung im Geburtshaus in Trier*. Trier, DE: Museum Karl-Marx-Haus.
- Negro, G. (2017). *The internet in China: From infrastructure to a nascent civil society*.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Neveu, E. (2018). Bourdieu's capital(s). In T. Medvetz, & J. J. Sallaz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ierre Bourdieu* (pp. 347-374).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mura, I., Kubo, S., Shibuya, T., Watanabe, N., Tairako, T., & Han, L. (2019). The german ideology: Online edi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online-dif.com/index.html>

- Piroddi, C. (2020). *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ontology: A study on Pierre Bourdieu and Axel Honneth*. Doctoral dissertation, Tampere University, Tampere, FI.
- Rancière, J. (2000/2013).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G. Rockhill, Trans.). London, UK: Bloomsbury Academic.
- Roberts, M. E. (2014). *Fear, friction, and flooding: Methods of online information control*.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US.
- Roberts, M. E. (2018). *Censored: Distraction and diversion inside China's great firewall*. Woodstock, U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admehr, M., & Bernhardt, D. (2011). Collective action with uncertain payoffs: coordination, public signals, and punishment dilemma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4), 829-851.
- Shadmehr, M., & Bernhardt, D. (2015). State censorship.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7(2), 280-307.
- Stoycheff, E., Burgess, G. S., & Martucci, M. C. (2018). Online censorship and digital surveil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ression technologies and democratization across countri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doi: 10.1080/1369118X.2018.1518472
- Sun, W. (2021). Chinese diaspora and social media: Negotiating transnational space. I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doi: 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13.013.1146
- Tarde, G. (1901/1969). The public and the crowd. In T. N. Clark, (Ed.), *Gabriel Tarde 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Selected papers* (pp. 277-294). Chicago, IL, U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opinion et la foule*. Paris, FR: Félix Alcan.)
- Uren, T., Thomas, E., & Wallis, J. (2019). *Tweeting through the great firewall: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PRC-linked information operations against the Hong Kong protests* (Issues paper Rep. No. 25). Barton, Australia: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 Veg, S. (2019). *Minjian: The rise of China's grassroots intellectuals*. Chichester, West Sussex, U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cquant, L. J. D. (1993). From ideology to symbolic violence: Culture, class, and consciousness in Marx and Bourdieu.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30(2), 125-142.
- Wacquant, L., & Akçaoğlu, A. (2017). Practice and symbolic power in Bourdieu: The view from Berkeley.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7(1), 55-69.
- Wallis, J., Uren, T., Thomas, E., Zhang, A., Hoffman, S., Li, L., et al. (2020). *Retweeting through the great firewall: A persistent and undeterred threat actor* (Policy Brief Rep. No. 33). Barton, Australia: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 Wang, J. (2019). *The other digital China: Nonconfrontational activism on the social web*. Cambridge, MA, 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Q. (2020). *The chinese internet: The online public sphere, power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 Wang, A. H. E., Lee, M. C., Wu, M. H., & Shen, P. (2020). Influencing overseas Chinese by tweets: text-images as the key tactic of Chinese propaganda.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3(2), 469-486.
- Wechatscope (2019, February 11). Censored on WeChat: A year of content removals on China's most powerful social media platform. Global Voices. Retrieved From: <https://globalvoices.org/2019/02/11/censored-on-wechat-a-year-of-content-removals-on-chinas-most-powerful-social-media-platform/>
- Weber, M. (1984-2020). *Max-Weber-Gesamtausgabe* (H. Baier, G. Hübinger, M. R. Lepsius, W. J. Mommsen, W. Schluchter, & J. Winckelmann, Hrsg.). Tübingen, DE: Mohr Siebeck.
-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isty Press.
- Woolley, S. C., & Howard P. N. (2019). Introduction: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Worldwide, In S. C. Woolley & P. N. Howard (Eds.)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Political parties, politicians,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on social media* (pp. 3-18).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u, H., & Sun, W. (2020). WeChat subscription accounts (WSAs) in Australia: a political economy account of chinese-language digital/social media.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doi: 10.1177/1329878X20932356

- Zhang, A., Wallis, J., & Meers, Z. (2021). *Strange bedfellows on Xinjiang: The CCP, fringe media and US social media*. Barton, Australia: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 Zhang, H. (2019, August 19). The "post-truth" publication where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get their news. *The New Yorke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culture-desk/the-post-truth-publication-where-chinese-students-in-america-get-their-news>
- Zhao, A., & DeDeo, S. (2020). Chinese astroturf beyond the Great Firewall and ineffective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doi: 10.31235/osf.io/6p53v

索引

二畫

人民日報

三畫

工業黨

《大綱》（*Grundrisse*）

四畫

支配（Herrschaft）

毛澤東

毛澤東主義（毛主義）

互聯網（internet，網際網路）

五畫

市民社會

布若威（Burawoy, Michael）

布希亞（Baudrillard, Jean）

布赫迪厄（Bourdieu, Pierre）

布爾喬亞（bourgeois，資產階級，
有產階級）

出版

刊物

左派

右派

左翼

右翼

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

生產（Produktion）

生產力（Produktivkraft, forces
productives）

生產方式（Produktionsweise,
mode de production）

生產關係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rapports de
production）

白雲先生（姚玉祥）

平等

正當性（Legitimität, legitimacy）

打賞

六畫

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合法性（Legalität, legality）

伊果頓（Eagleton, Terry）

共青團中央

共產主義

共產黨

在看

列寧（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Lenin）

七畫

社會

社會主義

阿多諾 (Theodor Wiesengrund-Adorno)

阿爾都塞 (Althusser, Louis)

八畫

朋友圈

青年大院

承認 (Anerkennung, reconnaissance, recognition)

奈格里 (Negri, Antonio)

空間

知識份子

九畫

韋伯 (Weber, Max)

柄谷行人 (Karatani, Kojin)

哈貝馬斯 (Habermas, Jürgen)

洪席耶 (Rancière, Jacques)

咪蒙

威廉斯 (Williams, Raymond)

十畫

馬克思 (Marx, Karl)

馬克思主義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時間

莫斯 (Mauss, Marcel)

班雅明 (Benjamin, Walter)

十一畫

唯心主義 (Idealismus, 觀念論)

唯物主義 (Materialismus, 物質論)

歷史唯物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

唯靈論 (Spiritismus)

習近平

梅洛—龐蒂 (Merleau-Ponty, Maurice)

國家

國族主義 (nationalism)

理論

西方理論

康德 (Kant, Immanuel)

象徵

象徵資本

象徵暴力

從屬 (Subsumtion, subsumption, 包摂)

形式從屬 (formeller Subsumtion)

實質從屬 (reeller Subsumtion)

十二畫

聯合

創作

黑格爾 (Hegel, G. W. F.)

無產者 (proletarian)

無產階級 (proletariat)

勞動 (Arbeit)

僱傭勞動 (Lohnarbeit, salariat,
wage labour)

勞動力 (Arbeitskraft, force de
travail, labour power)

勞動者 (Arbeiter)

勞動時間 (Arbeitszeit, temps de
travail)

十三畫

資本 (Kapital, capital)

資本主義 (Kapitalismus,
capitalisme)

資本家 (kapitalist, capitaliste)

《資本論》 (*Das Kapital, Le
Capital, Capital*)

資產階級 (bourgeoisie, 有產者、
資產者)

微信 (wechat)

微博 (weibo)

福柯 (Foucault, Michel)

經濟

經濟學

經濟科學

意識型態 (Ideologie)

意識形式 (Bewusstseinsform)

葛蘭西 (Gramsci, Antonio)

十四畫

寧南山

網信辦

趙皓陽

領導權 (egemonia, hégémonie,
hegemony)

齊澤克 (Žižek, Slavoj)

十五畫

價值 (Wert, valeur, value)

交換價值 (Tauschwert, valeur
d'échange)

使用價值 (Gebrauchswert, valeur
d'usage)

剩餘價值 (Mehrwert, plus-valeur,
surplus value)

價值增殖 (Verwertung,
valorisation)

《德意志意識型態》 (*Die
deutsche Ideologie*)

實踐 (praxis, practice)

緩緩君

十六畫

盧克文

霍耐特 (Honneth, Axel)

錢理群

十七畫

環球時報

十九畫

藝術 (art, Kunst)

藝術家

觀察者網

二十畫

外文

騰訊 (tencent)

github

二十畫以上